



黄鹤楼酒业，百年汉汾传承创新，两度荣获国家金奖，2011年认定为“中华老字号”。



苏恒泰伞店，一个半世纪五代接力，植入万家百姓记忆，2021年认定为“湖北老字号”。

编委会名誉主任：彭富春 周晓琦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冯天瑜 刘富道 严昌洪 何祚欢

陆永初 涂文学 萧志华 彭小华

董宏猷

编委会主任：张明权

编委会副主任：朱向梅 李定君

董菲 杨华

陈国方

编委会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焕桥 王四清 朱永利 任丽英

刘海燕 李文洲 李运玲 杨蒨

张智勇 陈胜利 林伟 陈红英

徐莉

主编：陈国方

副主编：朱伟峰 丁星火

执行主编：丁星火

特约编审：简桦

本期责任编辑：郑雅飞

编辑：许濛 严濂

特约编辑：华蕾 张川蕾

游迎

封面设计：王鹏

老字号脉

4 黄鹤楼酒，百年汉汾飘香 / 许鹏

8 苏恒泰，延续城市根脉 / 苏峰

九城同心

13 仙桃历史文化简介 / 苏林

15 沔阳三蒸的前世今生 / 陈锡椿 郭艳

20 “亚洲体操之乡”是怎样练成的 / 郭艳

三镇拾遗

26 “汉裋”风华 / 胡来旺

30 白求恩来华首诊的“五医院” / 麻建雄

委员天地

34 最是书香能致远 / 梁星

37 把读书作为履职的必修课 / 赵起

目录

CONTENTS

商聚汉皋

40 一名工程兵的科创理想 / 王剑(口述) 严濂(整理)

人物春秋

44 城市规划专家孙宗汾的不凡人生(下) / 张智海

史海钩沉

50 汉口法租界梅医生纪念碑 / 章辉 袁厚翔

都市史话

55 鸡公山上的老汉口史迹 / 靳小蓉 万建辉

往事漫忆

61 走近聂华苓 / 尹新秋

主 管：政协武汉市委员会

主 办：武汉市政协文化文史和
学习委员会

编辑出版：《武汉文史资料》编辑部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发行单位：《武汉文史资料》发行部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4-1737

国内统一刊号：CN42-1056/K

印 刷：武汉市仁大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每月 28 日

定 价：8 元

地 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 246 号

邮 编：430010

电 话：(027) 82220669 (传真)

E-mail: whzxwszl@163.com

黄鹤楼酒，百年汉汾飘香

◇ 许 鹏

提起黄鹤楼酒，许多老武汉人都有着自己的独家记忆，它或是准女婿上门，送给老丈人的提亲酒；或是恰逢喜事，与亲朋好友共同畅饮的庆贺酒。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黄鹤楼酒就是武汉人自己的酒。

从清朝到现代，黄鹤楼酒的发展有过辉煌，有过低谷，但黄鹤楼酒人“感恩、向上”的精神内核，至今一脉相传。

始于汉汾 佳酿天成

黄鹤楼酒传承于风靡荆楚大地的汉汾酒，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据《汉阳县志》所载，宋代酒税达到三万贯，说明酿酒业初具规模。

清乾隆年间，一位名叫李大有的酿酒师，发现汉口人烟稠密、商贾云集、粮食丰足、水质优良，是酿酒、卖酒的理想之地。决定在此安家落户，邀请四方酿酒名师，在硃口码头建立“李大有槽坊”。

李大有将山西的酿酒方法引入汉口，融入南方酿酒技艺，取优质高粱为原料，用小麦、大麦、豌豆作大曲发酵剂，用汉江水系的深层井水精心酿配，酿出了晶莹透亮、清香醇厚、甘冽爽口、回味悠长的汉汾酒。

汉汾酒口味清新独特，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硃口的酿酒业也抱团发展，愈发繁荣。

晚清名臣张之洞主政湖北多年。1898年，张之洞订购了一批汉汾酒带进京城，此酒迅速得到王公大臣的一致推崇。于是，张

之洞精选了最优质的汉汾酒进献光绪帝。光绪帝品饮后大加赞赏，下令成立一个专门为皇家酿制御酒的酒坊，并亲自定名为“天成坊”，寓意“佳酿天成，国富民强”。



老天成汉汾酒获巴拿马万国赛会优胜奖后宣传酒标

到了民国年间，硚口码头附近的酒坊，有老天成、大有庆、白康、同源等60余家，有的经营门市，有的前店后厂自产自销。其中，老天成共有七个槽坊，分别叫作：仁记、祥记、德记、宏记、永记、新记、益记。各记主要生产汉汾酒，另有五加皮、桔黄酒、黄碧绿、红玫瑰、白玫瑰、虎骨酒等。

老天成资本厚实，产量最大，经营灵活，不仅在本地销售，在天津、江西、广州及九江、沙市、宜昌等地都有分铺，并有专门的销售人员，将老天成各类产品销往广东、香港等地。

新中国成立后，酒类列为国家专卖品。1952年，武汉市政府整合老天成、白康、同源等几大酒坊，成立了国营武汉酒厂，即现在黄鹤楼酒业的前身。

武汉酒厂成立后，在硚口太平洋路建设新厂区，提高工人福利待遇，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在延续传统工艺生产汉汾酒的同时，增设生产线，丰富产品种类，恢复了老天成时期的传统产品碧绿酒、保元酒、五加皮酒等。生产工艺逐步由笨重的手工操作方式，改为机械化或半机械化的操作，产值大幅度增长。1954年，武汉酒厂工业总产值达到87.17万元，逐步发展壮大。

1962年，开始推出“黄鹤楼特制汉汾酒”。特制汉汾酒是在汉汾酒的基础上演变提升而成，所谓“特制”就是工艺与汉汾不尽相同，以示区别。据《湖北省志·工业志》和《武汉市志》记载，1979年，武汉酒厂生产50度白酒11891.16吨，产量突破万吨，成为全国白酒产量最大的酒厂，产品畅销全国各地。

1991年，武汉酒厂更名为黄鹤楼酒厂，开启了新的发展征程。



1980年代武汉黄鹤楼酒厂

两度摘金 北汾南楼

黄鹤楼酒业传承创新，众多产品一经上市，就获得市场广泛赞誉并成为武汉人的时代记忆，其中最受欢迎并蝉联两届“中国名酒”称号的就是“特制黄鹤楼酒”。

早在1962年，武汉酒厂在汉汾酒基础上投产特制汉汾酒。为了做好这个产品，抽调骨干人员成立了专班，先后多次派人到国内优质清香型白酒产区调研，全面了解清香型白酒酿造技艺，对酿造环境、微生物作用等方面展开分析，科学总结酿造经验。专班人员反复钻研，各取所长，既继承汉汾酿造传统工艺，又汲取清香型白酒酿造的科学经验，相互结合推出高品质特制汉汾酒。

1974年，经过12年的不断探索和总结提高，特制汉汾的工艺与风格基本定型，其品质已居中国白酒前列。它以大曲为糖化发酵剂，采用传统的清蒸两次工艺，固态地缸发酵，缓慢蒸馏，分段摘酒，分级入库，长期贮存。酒体清澈透明，酒味清香纯正，具有入口醇厚绵软、后味爽净悠长的特点。

1984年，在特制汉汾酒基础上，推出特制黄鹤楼酒，并代表湖北省参加第四届全国评酒大会。经全国顶级品酒、酿造专家的严格评比，在参评的诸多品牌中，特制黄鹤楼酒与茅台、汾酒、

五粮液、洋河大曲、剑南春、古井贡酒、董酒、西凤、泸州老窖特曲、全兴大曲、双沟大曲、郎酒等一起评为“中国名酒”，由国家质量奖审定委员会授予“国家金质奖”，并获轻工部酒类质量大赛金杯——这也是武汉市地方工业获得的第一块国家级金牌。

据时任厂长彭先光回忆，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颁奖大会，他作为武汉酒厂的代表，坐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5排28号座位，感到荣光和骄傲。厂长捧奖归来，厂外的太平洋路上满是职工一路迎接。

1989年，第五届全国评酒会在安徽合肥举行，评出17种国家名酒：茅台、汾酒、五粮液、洋河大曲、剑南春、古井贡酒、董酒、西凤、泸州老窖特曲、全兴大曲酒、双沟大曲、特制黄鹤楼、郎酒、武陵酒、宝丰酒、宋河粮液、沱牌曲酒。武汉酒厂出品的54度特制黄鹤楼酒，再次评为“中国名酒”，再次荣获“国家金质奖”。

正由于特制黄鹤楼酒连续两届跻身“中国名酒”行列，它与山西杏花村汾酒并称为中国两大清香型名酒，被业界和广大消费者誉为“北汾南楼”。



1984年第四届全国评酒会获金质奖，评为“中国名酒”

百年匠心 清香回归

2016年，一句“汉汾酒的工艺一定要恢复和传承下去”掷地有声，唤醒记忆的一角，黄鹤楼酒业正式开启清香型酒复兴的征程。

六年磨一剑。2022年7月30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静待已久的醇美浆液启封，“黄鹤楼酒业战略新品·楼20”上市发布会隆重举行。国内知名白酒品评专家、众多权威媒体齐聚一堂，同品这一

道凝聚了时代记忆与匠心匠艺的老味道，体验融合了全新内涵与现代创意的新感觉。

黄鹤楼清香型白酒，承百年工艺，凝千万匠心，开酿仪式在酿酒师傅们铿锵有力的酿酒誓词中拉开帷幕。仪式现场，嘉宾同聚清香名酒车间，开缸、取醅、上甑、蒸酒、祭酒神，浓郁的清香气味满溢天成坊，共续“南楼”佳话。

封坛时刻，在辛氏酒馆门口，20位封坛嘉宾签名题字，将20坛封坛原浆入窖封藏，静待时光淬炼，酝酿玉液琼浆。嘉宾一行还在黄鹤楼酒第三代酿酒传承人、国家级酿酒师钱焱林的讲解下，深入酿酒车间，聆听汉汾故事，细品清香匠心。

这是一场时间欠下的盛大礼赞。在全场嘉宾满怀期待的目光和热烈的掌声欢呼声中，“黄鹤楼酒·楼20”盛大揭幕，传承百年的汉汾酒以“南派大清香”身份盛装归来，回归名酒高度，寓意“大曲清香、大味清香、大国清香”。

经过细致的品鉴、热烈的讨论，专家一致认为：“黄鹤楼酒·楼20”无色透明，清香纯正典雅，粮香舒适，陈香突出，醇厚



2022年9月25日，武汉市委副书记、市长程用文调研黄鹤楼酒业经营情况

丰满，甘润柔顺，自然谐调，爽净绵长，具有黄鹤楼大曲清香型酒的独特风格。品质是品牌之基，品评专家的认可，也是对黄鹤楼清香名酒回归、再现南派清香之盛景的高度信任。

历世百年时光流转，如今浴火得以重生，是汉汾之幸，也定是必然之果。黄鹤楼酒业怀揣着对传统文化的敬畏心，对百年技艺的自豪感，对开拓未来的奋斗魂，力争重回“中国名酒”价值本位，重拾鄂酒地位，加速推进黄鹤楼酒在中国清香型名酒版图上快速崛起。

从汉汾酒到特制汉汾酒，再到特制黄鹤楼酒，直至今天的黄鹤楼大清香系列，黄鹤楼清香型酿酒工艺一脉相承。黄鹤楼酒业，始终用精益求精的工匠之心、坚毅无畏的社会责任，诠释“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的企业价值观，为广大消费者贡献美酒。

许鹏，黄鹤楼酒业党委书记、董事长，
武汉市人大代表

苏恒泰，延续城市根脉

◇ 苏 峰

“苏恒泰”伞店，1861年在汉口汉正街创立，“恒泰”取长久安康之意，既指产品结实耐用，又指护佑顾客通达四方。从1928年在湖北省第一次国货博览会上荣获一等奖，到2015年赠送来华访问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夫妇，再到2021年认定为“湖北省老字号”，它已传承160多年了。

苏恒泰油纸伞以优质耐用著称，相传向伞面投以石子，伞面竟能将石子弹回。过去在汉川、钟祥、沔阳一带，凡有闺女出嫁置办嫁奁，必不可少要定购苏恒泰红、蓝油纸伞各一把，以示红男绿女、子孙开枝散叶，蕴含家族繁茂、婚姻美满长久之祝愿。

这一切，是从我高祖父开始的。

苏恒泰的掌柜——一人打了个码头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我的高祖父苏文受服兵役多年，因伤退役回到湖南长沙县东乡石门坎老家，却发现祖业已被豪绅霸占。他变卖家产也没打赢官司，一气之下携妻远走他乡，来到汉口集稼嘴以修伞为生，因手艺好价格公道渐受欢迎。

同治三年（1864年），高祖父便在汉口山陕会馆关帝庙旁的魁斗巷，购置小板铺门面一间，起名“苏恒泰伞店”，开始制售油纸伞。他吸收修伞时见过的各式伞的长处，使之集优荟萃，打破了以地域划分油纸



苏恒泰第五代苏峰检查他刚做好的油纸伞

苏恒泰的伞——不用撑

那时正赶上“同光中兴”，伞店的业务欣欣向荣，家业不断做大。长沙购置的水田，湘潭喇叭街的伞厂、江夏的鱼塘、武昌的门店都需要人出面经营。

为此，老嫫（老祖母，湖南方言称呼奶奶为嫫）将我15岁的曾祖父苏云生（字吉云）立为掌柜。曾祖父可谓真正的高富帅、富二代，

可惜他身体一直不好，不能专心经营伞店，一切全凭老嫫作主打理。老嫫出身浙江余杭制伞世家，太平天国起义期间，嫁给了前去“平乱”的高祖父。

一年春夏，天旱少雨，雨伞卖不动，伞店流动资金紧张，工资都快发不出来。老嫫要曾祖父想办法多卖点伞，曾祖父只想敷衍一下，随口让师傅们在店门外制作浸柿漆的“琢伞”，招徕顾客。这么热的天在烈日下做事，师傅们觉得是东家把亏他们吃，便想让东家也吃点亏，就在店门口磨洋工，反复往伞面上浸柿漆，以此耗损东家的原料。

一晃到了发工资的时候，曾祖父就让师傅们拿自己做的伞去卖了抵工资，哪知师傅们走到半路，伞就被人拦下买空了。原来，这批产品伞面紧实，油厚质坚，晶莹透亮，敲击时发出犹如鼓面的“嘭嘭”声，掂在手里比平时更有分量。这一来，又引得顾客纷纷登门求购，原本积压的伞销售一空，这也是苏恒泰后来的秘密武器——“苏恒泰浸油琢伞”的由来。

苏恒泰的伞油上得多，就比别家的伞

伞品种的局限，为日后成为享誉海内外的品牌打下了扎实基础。

随着口碑的积累传播，销量不断增长，高祖父常去码头提取订购的竹子、纸张和桐油等原材料，引起码头一个把头眼红。他声称哪怕一张纸，也要由他安排搬运工才能上岸，借此强收高额的力资费。高祖父认为把头是在勒索自己，血气上涌与把头争辩起来，表示自己能拿的货不需要额外付费，但把头平时欺负人惯了，根本不由分说，喊来打手想教训人。

高祖父自幼习武，又多年在战场出生入死，根本不把这小场面放在眼里，三两下就将几个地痞打趴下了。把头见状不妙，迅速召集所有搬运工来抓高祖父。据说，那天高祖父血性迸发，不畏强暴，一个人徒手夺了40根扁担。

此后，汉正街宝庆码头一带，便流传一句歇后语：“苏恒泰的掌柜——一人打了个码头”，形容好汉不惧江湖，敢与恶势力斗争。但由于积劳成疾，又一直有军旅伤痛在身，高祖父不幸早逝，时年40余岁。

重一些，汉正街又流传一句歇后语“苏恒泰的伞——不用撑”。这个“撑”字一语双关，既有一掂就知重量而不用秤称，也有不用“撑”开伞验货就知好坏的意思。

而且，由于柿漆越浸颜色越深，内含的单宁成分可防紫外线，“琢伞”在晴天也有市场需求。此外，反复涂抹柿漆而堆积形成的膜层，又大幅提升了整体牢固度，传言一人遇上楼房失火，情急之中抓起一把油纸伞，从楼上跳下来毫发无损。众人称奇，围拢一看原是苏恒泰的伞，一传十，十传百，口碑更好。

但产柿季节短，柿漆制作周期长，还需人工反复晾干涂抹，导致“琢伞”成本很高，可顾客就是喜欢专挑此伞。曾祖父便打



浸柿漆的“琢伞”

开思路，在每十把“行货”伞中，加一把“琢货”而不加价，有幸买到的顾客犹如中奖一般喜笑颜开。

苏恒泰的品牌——走向海外

然而，曾祖父因长年患病也不幸早逝。在他患病后期无法管理伞店时，老娣驰便将她的孙子、也就是我爷爷苏荫泉，从长沙老家接来汉口。老娣驰培养接班人很有经验，而爷爷也勤勉有加，日后就是他在纷乱年代里，将苏恒泰这个品牌推向了“中国名伞”的顶峰。

爷爷苏荫泉（字啟贤），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生于长沙县东乡石门坎，16岁来汉口学习制伞全套工艺，19岁时老娣驰认为他可以接班了，便拿出银子请人带他在武汉三镇吃酒听戏喝茶见世面，刚刚开业的新市场、赛马场等一一光顾。连续游乐三个月后，老娣驰见爷爷对玩乐感到倦怠，便问爷爷还想玩吗？爷爷当即回答：“世面已经见过了，不想再玩了，想帮家里做事情。”

在老娣驰的主持下，爷爷18岁便成家。奶奶叫欧阳啟芳，家住汉阳南岸嘴，籍贯湖南益阳，家里开作坊加工伞轱辘、伞柄等木构件。

爷爷亲历了中国近代外忧内患的动荡，见证了无数企业的兴衰沉浮。他悟到，一个企业最重要的资源是企业家本身的素质，因此他坚持读书学习，阅读进步报刊。他生活艰苦朴素，常年一身对襟短衫和一双布鞋，从来不穿西装皮鞋。他不抽烟，不喝酒，只在每年春节陪师傅们打几圈麻将，然后故意把面前的银元输完后离场。

爷爷不断创新生产方式，将制伞工序

改为流水线生产，大大提高了效率。他不断研发新工艺，改良原材料，终于将苏恒泰油纸伞打造成湖南湖北两省制售，年产销 20 万把，享誉海内外的著名民族工业品牌，南至暹罗马六甲，西至东欧土耳其，北至朝鲜都拥有忠实客户。1936 年汇编的《中国民族工业通志》中，记录了苏恒泰油纸伞的出口情况及各品种的销售价格。

苏恒泰的往事——动荡年代的艰辛

2016 年暑假，一个老街坊在展会上见到“苏恒泰”，便告知她住在十堰的老姐姐吴婆婆。吴婆婆 81 岁了，回汉与家人相聚时邀请我见面，亲切讲述她童年与苏恒泰的往事。她家住苏恒泰隔壁，我也依稀记得小时候见过她，我家长辈叫她“熹熹”。

吴婆婆说她是家中长女，家境贫穷勉强维持她上学，但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不是做作业，而是替家里加工 5 把伞架——将伞架撑开，在边沿绕上纱线，以备后续裱糊纸伞衣。绕好的伞架，可以拿去苏恒泰换回 1 角 5 分钱，作为她一天的生活费。遇上淡季，没有这样的加工活可做，她第二天便没法过早，常饿肚子上学。这情景只要被我爷爷看见，都会塞她两角钱，跟她说：“熹熹，莫怕咧，好好读书，读好书以后就不会挨饿了。”后来，她确实成为一名优秀的汽车工程师。

熹熹父亲吴师傅也是湖南人，也以做伞为生，但由于店小而无力完成最后一道工序——熬桐油。她说，一来，此手艺不外传，并且传男不传女；二来，就算是熬桐油的老师傅，也会因气候变化或几秒钟的疏忽而熬出废品，可小店是承担不了一大锅损失的。所以，她家以加工伞骨架为主，可淡季吴师

傅总是唉声叹气。这时，我爷爷便会跟他说：“照着我们的伞骨架样子做，挑好的晚上送店里面来。”

谁料想，就是这小小伞骨架，引发了一场大风波。日据时期，日寇设卡检查货物，断绝一切资源流向后方。一年春夏，正是雨伞交易旺季，突然一批伪军封锁街道，包围伞店，声称检查出境货物时，发现一批苏恒泰伞杆中夹带有子弹，必须带走店子所有人审查。

这时爷爷也不慌张，与伪军队长交涉说，就算走私弹药也不会用这大个店铺来冒险，一定是有人栽赃陷害。队长也知道我爷爷在汉正街的威望，于是仔细检查扣押的那一批伞，发现只有盖了“吴恒兴”章子的，也就是熹熹家加工的伞里面才有子弹，便将吴师傅押走，关入南京路口大孚银行地下金库改建的水牢拷打审问，借机敲诈勒索。我爷爷拿出一大笔钱周旋，才终于将吴师傅营救回来，他的胸膛已经被打开了花。



苏恒泰第三代苏荫泉和第五代苏纯



苏荫泉在汉口居住过的汉正街全新巷4号

不久，日本人投降了，可国民党反动派又发动了内战，物价疯涨。爷爷每天下午都急着将上午卖的货款法币，想方设法换成物料，不然钞票隔夜就会贬值。

1948年底临近过年时，有几个人自称稽查队来店搜查，带队的姓陶，说：“接线报，你们伞店私卖烟土，现来核查。”他们一边装模作样地搜查，一边拿出备好的鸦片扔在柜台内，再假装高喊搜查烟土，不由分说将在店里的我奶奶绑走。

爷爷回来后，几经辗转才打听到所谓稽查队是从武昌过来的，便委托在洪帮有较高地位的街坊杨包（诨名）出面周旋，最后付出500银元（约普通工人的8年薪水）的代价，才将奶奶赎回。

苏恒泰的未来——传递百姓共情

这些年来，我代表苏恒泰参加展会活动时，经常遇见一些老者，他们一边看伞摸

伞，一边喃喃自语：“我小时候看见你家伞铺晒伞，一片一片的，我就在里面穿来穿去地玩，师傅就出来赶我们。”“我小时候家里穷，我们小伢有把破油纸伞打都不错，哪个伢打把没有破的油纸伞上学，那就是条件蛮好的屋里。”

这一刻，老人们的思绪穿越回了童年，而我读到的是纯真和困窘。当老人们放下伞转身慢慢离去时，留给我的却是震惊，油纸伞竟如时光宝盒一般，让我看到一个个佝偻的身躯，也曾是翩翩年少的模样。我突然感悟到，或许传递这份共情，才是传承这把油纸伞最重的分量。

进入新世纪，作为第五代传人，我们兄弟三人分工合作，恢复了濒临失传的部分手艺，延续了原材料的生产供应。近年来，国家加大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也鼓励创新发展。苏恒泰赢得有关部门的鼎力支持，先后在硚口古田四路江城一号文创园、东西湖慈惠街紫藤文化村，建立了展示研发基地。

苏恒泰油纸伞，2014年被武汉市旅游局认定为“武汉礼物”，2015年作为特别礼物赠给访问我国的比利时国王菲利普、王后马蒂尔，2017年入选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本人，也荣幸成为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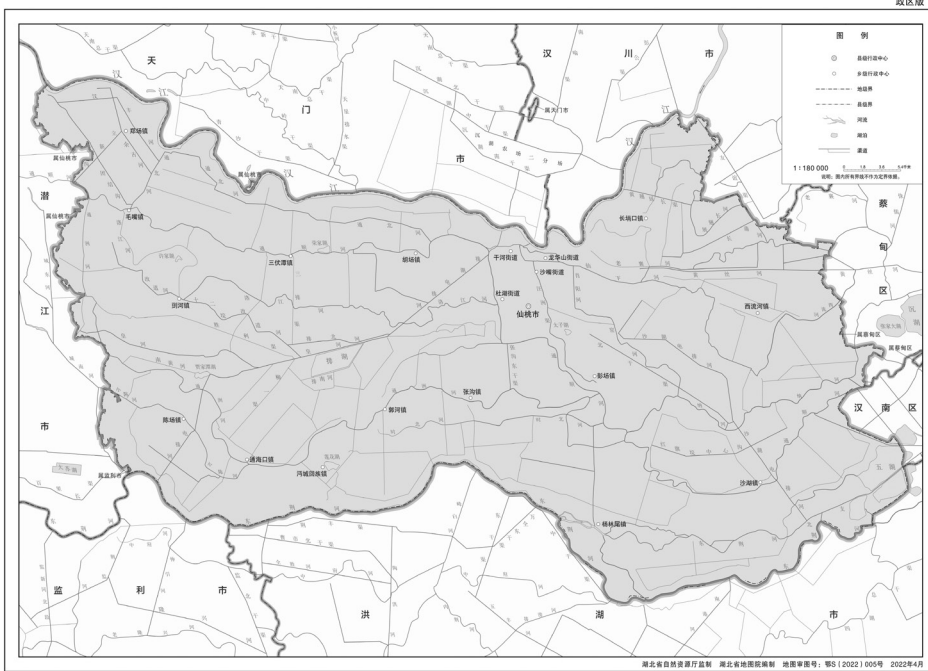
一个半世纪以来，苏恒泰承载了这座城市太多的记忆。如今，苏恒泰油纸伞作品，由湖北省档案馆、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中国伞博物馆永久收藏。但它的存在，它的传承，它的发展，更多是为了印证一座楚地之城的崛起，延续这座城市的根脉。

苏峰，苏恒泰第五代传承人，硚口区政协常委，武汉市民间工艺大师，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仙桃历史文化简介

◇ 苏林

仙桃市地图



仙桃地处江汉平原腹地，是湖北省直管市、武汉城市圈西翼中心城市，是闻名全国的鱼米之乡、文化之乡和亚洲体操之乡，是荆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1986年5月27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沔阳县，设立仙桃市。全市国土面积2538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10.51万。获评国家园林城市、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城市、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市、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市，素有“江汉明珠”的美誉。2022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榜单上，仙桃位居第65位，居全省县市第一。

历史文化积厚流光。仙桃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楚文化六大支柱，除青铜冶炼外，丝织刺绣、木竹漆器、美术音乐、老庄哲学和屈骚文学都可在仙桃找到痕迹。先后发掘出的沙湖遗址和越舟湖遗址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存，大致距今4000—5000年，其中沙湖遗址上存有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和西周文化层。从源远流长的史前历史，到文化繁荣的晚清民国，跨越千年

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城市、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市、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市，素有“江汉明珠”的美誉。2022年，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榜单上，仙桃位居第65位，居全省县市第一。

历史文化积厚流光。仙桃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楚文化六大支柱，除青

光彩灿烂的历史文化瑰宝滋养着这颗“江汉明珠”。

红色文化播撒种子。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仙桃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工农运动。土地革命时期，这里发动了戴家场暴动，举行了沔城暴动，诞生了中国共产党湖北沔阳工农革命军第五军。1930年贺龙、邓中夏率红二军团攻占沔城和仙桃（其时为沔阳重镇）后，苏维埃运动在沔阳县如火如荼，沔阳县被视为洪湖苏区的发祥地。

名人文化星光璀璨。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陈友谅，加速了元王朝的灭亡，首创武昌船厂，推进了中国水军和造船业的发展。明清时期文学创作空前繁荣，陈柏、童承叙、陈文烛、费尚伊、陆建瀛等人著作流传后世。童承叙的《沔阳志》被誉为海内三名志之一。近代以来，民国时期的教育家陈青之编撰了第一部完整的《中国教育史》。中国大陆第一个民法学博士王利明，还有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明楷等88名从仙桃走出去的法学专家，出版专著400多部，形成仙桃籍法学专家群体现象。小米科技掌门人雷军被誉为“东方乔布斯”。正可谓前贤不断，后俊无穷。

体育文化敢为人先。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仙桃人李小双夺得中国体操史上第一块个人全能金牌，获“全能王”美誉。2012年11月，被亚洲体操联合会授予“亚洲体操之乡”。迄今为止，仙桃先后为国家和省里培养输送了68名优秀体操人才和11名优秀举重、摔跤人才。从这里走出了李小双、杨威、郑李辉3位奥运体操冠军，以及世界体操冠军李大双，奥运举重冠军廖辉。“奋发向上、敢为人先、争先创优”的仙桃

体育精神，是仙桃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饮食文化韵味悠长。仙桃地方特产数沙湖咸蛋、沙湖皮蛋和毛嘴卤鸡。沙湖红心咸蛋名扬中外，曾为清朝皇室贡品，是咸鸭蛋中的翘楚。沙湖湖区水草丰茂，虾肥螺密，湖区生长的麦黄角草是麻鸭的天然饲料，以麻鸭蛋制作的咸蛋，蛋黄油润如朱砂，蛋白柔嫩似白玉，故有“一点珠”的美誉。据史料记载，让沙湖咸蛋最早扬名京城的是清末翰林李绂藻，李绂藻在京任职期间，曾请假回沔阳扫墓，回京时捎带沙湖特产咸蛋、莲子分享同朝，使“沙湖盐蛋”“沔阳莲肉”誉满京城。沙湖无铅皮蛋，松花晶莹，蛋黄溏心入口绵软。号称“荆楚一绝”的毛嘴卤鸡，以其肉质细嫩，熟而不烂、嚼之不腻的口味特色，深受消费者青睐。“两蛋一鸡”是好客的仙桃人招待客人的首选佳肴。

民间文化异彩纷呈。近代仙桃重要的民间艺术，当是沔阳雕花剪纸、皮影戏和花鼓戏。沔阳剪纸在工艺上，不仅有剪纸，更有雕花——镂空与雕刻。从越舟湖遗址出土的磨制石铲上的穿孔和陶器上的刻文，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出现了镂空雕刻的工艺。发展到明末清初，沔阳剪纸形成风格，以构图匀称、雕工纤细见长。由歌腔皮影和渔鼓皮影组成的沔阳皮影戏极具艺术魅力，其所保留的楚俗、楚文化和楚音乐极其重要。沔阳花鼓戏旧称“沔阳花鼓”，俗称“花鼓子”，曾称“荆州花鼓戏”，诞生于清初沔阳州。其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是湖北三大地方剧种之一，2010年仙桃市成功申报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苏林，仙桃市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

沔阳三蒸的前世今生

◇ 陈锡椿 郭 艳

沔阳三蒸是江汉平原家喻户晓的百姓菜，湖北十大名菜之一，也是中国名菜。它以江汉平原优质食材为主要原料，以粉蒸为主要技法并涵盖多种蒸法，因起源于沔阳而得名。沔阳三蒸，是一个蒸菜系列，在民间曾流行三道菜（蒸鱼、蒸肉、蒸菜）和三类菜（畜禽类、水产类、蔬菜类）之说，其实“三”的本义是“多”，“三蒸”实际上是无菜不蒸。

蒸菜前身是糊糊菜

沔阳三蒸作为地方名菜载入《中国名菜谱》。名菜一般是昂贵的宫廷菜，正所谓“帝王一席膳，百姓半年粮”，沔阳三蒸却是沔阳人为了糊口摸索出来的家常菜，

家家户户皆可制作，后来广受好评，成为当地宴席的必备菜。

沔阳先民早在 4000 多年前就掌握了蒸的技法，利用蒸汽的热能加工饭菜。1980 年代从沙湖、越舟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的文物中，可以看到含谷壳的红烧土和鼎、鬲、坛、罐、壶、杯、碗、甑等生活用陶，谷壳证明了水稻的存在，鬲、甑证明了蒸的可能。

民间流传沔阳三蒸的发明，有两种传说。一说是元末农民起义领袖陈友谅的夫人张娘娘（张凤道），为了缓解陈友谅起义军被围困排湖粮草不足的情况，采来湖区的荷梗、菱角藤，在湖里摸来鱼虾做食材，再把米磨碎，碎米和食材一起蒸熟，后来这个蒸菜的方法传到了民间。另一个说法是陈友谅的夫人罗娘娘，为了改善士兵伙食，



仙桃市梦里水乡文化旅游区的“天下第一蒸”

想出来的“一甑熟”，犒赏在官垱湖打了胜仗的士兵。

两种传说中，沔阳三蒸无论是当作“度荒菜”，还是“胜利菜”，反映的都是湖区特有的地理环境和物产特色，具有极其浓厚的民间气息。客观来说，应是先有粉蒸菜，后有传说。但曲折离奇、引人注目的故事，推动了沔阳三蒸在民间的广泛传播和发展。

民谣“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是沔阳历史上频发水患的真实写照。灾情导致粮食歉收，百姓三餐难以为继，常常是“糠菜半年粮”。百姓们只得将有限的大米磨成细粉，撒在野菜汤中熬成稀糊糊充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仙桃为度饥荒使出了糊菜绝招。那个时候，全镇大小餐馆卖的几乎都是糊包菜、糊萝卜、糊白菜。旧时农村生活是很艰难的，其富足指数往往见诸主食的稀、稠、干，从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糊菜汤，到稠厚的菜糊糊，再到干的米粉蒸菜。所以说，沔阳三蒸的前身是糊糊菜，粉蒸菜是在菜糊糊的基础上发展并产生的。起源于民间的沔阳三蒸，拥有扎根民间的草根特性。

民间菜成了明星菜

沔阳三蒸的叫法起于何时？它是如何在市场上声名鹊起的呢？

沔阳人喜欢吃捞饭，即将大米煮至半熟，再捞出大部分米沥干，留少许米粒同米汤熬成米汤粥，然后将捞出的饭生子（半熟的米）放入木甑中蒸成熟饭，这就是沔阳老百姓说的捞饭

或甑蒸饭。所谓“家有一半，搭粥煮饭”，甑里的饭生子不能把甑装满，勤俭持家的主妇用这个空间做起了文章，把南瓜、豆角等蔬菜用盐和大米粉拌一拌，平铺在饭生子上一一起蒸，饭菜一起蒸熟，省时、省工还省柴。如果家里来了客人，把蔬菜换成鱼、肉就是待客的菜。家里来客上甑蒸蒸菜，也是民间的待客礼仪。沔阳三蒸脱胎于饭甑，靠小溜子（极小的蒸笼）在民间餐饮市场发展起来，也就有了当今的声誉。

台湾学者张起均，在《烹调原理》一书中写到了“沔阳蒸菜”：“因此这‘汽’实可说是介乎油与水之间的，也可说是兼取油与水之长的一种媒介体。——这种媒介体从烹调的艺术观点讲，不免稍嫌单调，但其实用的价值却非常大，不仅可以大量地蒸馒头、蒸包子等，为北方人所必需；同时一个大屉笼中，可以蒸很多样菜，非常省时、省事。尤其在往昔农村中，农民为了节省燃料，许多东西，连菜带饭，一锅就蒸出来了，多么经济而方便。湖北的沔阳蒸菜就是这么发展出来的。”

张起均先生没有用“沔阳三蒸”，用的是“沔阳蒸菜”。符号先生在《仙桃十三泰》一文中写到民国早期的汉口有两家“沔阳饭馆”，北京虎坊桥有一家“湖北餐厅”都以经营“三蒸”出名。民间传说张学良在北京虎跑坊题联“一尝有味三拍手，十里闻香九回头”，他所品尝的那家店被误传为“湖北三蒸馆”，实则门脸为“湖北蒸菜馆”。

“沔阳三蒸”与“沔阳蒸菜”是同义词，其内涵和外延完全一致，前者可能是以“沔阳三蒸馆”为招牌的餐饮店生意好、名声大形成的。沔阳三蒸走向市场离不开深厚的民间基础，一个是沔阳三蒸占据了民间酒席的半壁江山，再就是小溜子使其得以迅速市场化。沔阳三蒸传承谱系第一支线第二代传承人金七斤说，新中国成立初期，沔阳民间酒席上的菜，有一半是蒸菜，即“三蒸九扣”。酒席上菜讲究出菜速度快，还能保证菜肴的温度，蒸笼蒸菜很好地满足了这个条件。时至今日，蒸菜依然是沔阳酒席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沔阳三蒸的市场化得益于小溜子（直径四余寸，高不足三寸）。一套小溜子由蒸

锅、气盆、蒸笼三部分组成，小溜子蒸笼一般可叠加十多层（格），其最大特点和优势在于蒸汽相对集中，能较快速地将食材蒸熟。又因江汉平原食材丰富，丰富“沔阳三蒸”菜品的同时，就有了沔阳“无菜不蒸”之说。

沔阳三蒸是中国烹饪发展史上最具地方特色的菜肴之一。它由劳苦大众创造，在民间传承和发展，积淀了丰富的饮食文化内涵，有着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民国时期，沔阳人刘松山先后在汉口民乐楚剧院对面的三新街和民生路统一街口开设“沔阳饭店”。工商界、军政界人士纷纷慕名来沔阳饭店品尝蒸菜。张难先亲笔为沔阳饭店题词“家乡风味”。

越是地方的越是世界的

2015年7月，在法国巴黎举办的“中国美食国际文化节”暨2015年巴黎国际中餐烹饪大赛上，湖北团体作品荣获五钻金奖，沔阳三蒸“非遗”传承人伍峰斩获个人五钻金奖。沔阳三蒸走出国门，跨入世界饮食文化殿堂。

此前，经过层层选拔，伍峰接到中国烹饪协会和中国名厨委发出的参赛通知。伍峰虽在烹饪赛事中拿过一些奖项，但出国比赛却是第一次。弘扬沔阳三蒸文化，让更多人了解沔阳三蒸的历史和内涵，分享沔阳三蒸的健康美味，是身为沔阳三蒸制作技艺传人心里的梦。能参加巴黎国际中餐大赛和饮食文化交流，把沔阳三蒸介



2015年首届沔阳三蒸节上，陈锡椿老师（中）现场点评

绍给世界，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因此，伍峰向组委会提出自己的想法，能不能以地方特色菜肴参赛？这个想法得到大赛组委会的支持和批准。经过深思熟虑，他确定选用经过几代厨师不断改进的粉蒸松鼠鱼和比较成熟的新派沔阳三蒸去参加比赛。



粉蒸松鼠鱼

参加这次国际烹饪大赛和文化交流的，有来自法国、美国、英国、俄罗斯、荷兰、韩国等 23 个国家和地区的中餐界人士，以及国内 24 个省市自治区的参赛选手，一共 126 名厨艺高手。这次活动是随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刘延东一起出国，湖北代表团由卢永良教授带队。

7 月 30 日，湖北参赛团以“荆楚武昌鱼宴”亮相，精心制作的菜肴和水乡风韵的展台设置，获得了赛事评委的称赞。次日，颁奖晚宴在巴黎金色大厅举行，湖北团体作品获得五钻金奖，伍峰大师所做的粉蒸松鼠鱼、荷花莲心和珍珠圆子以 94.5 分的全场最高分夺得个人五钻金奖。

沔阳三蒸是沔阳人代代相传的地方特色菜肴，是仙桃人智慧的结晶。经过几代人的孜孜追求，沔阳地方菜亮相巴黎，扬名海

外，三蒸文化远播欧美，为中外饮食文化交流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份殊荣是所有沔阳三蒸非遗传承人的骄傲，也是仙桃人的骄傲与自豪。

“非遗”技艺的活态传承

改革开放以来，仙桃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沔阳三蒸品牌和产业发展，制定了支持沔阳三蒸产业的优惠政策和具体措施，为推动沔阳三蒸品牌化、规模化、产业化做了大量的工作，不遗余力地推动沔阳三蒸的传承与发展。沔阳三蒸协会编制《中华沔阳三蒸传承谱系》，建立起沔阳三蒸传承人制度，宗旨是让传承人肩负起弘扬沔阳三蒸饮食文化、传承沔阳三蒸技艺的使命。近十年来，沔阳三蒸的发展一步一个脚印，坚实有力。

2011 年 6 月，湖北蒸菜制作技艺（沔阳三蒸制作技艺）入选湖北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项目名录。



2015 年 3 月，中国烹饪协会将仙桃市认定为“中国沔阳三蒸之乡”

2014年5月，在第七届全国烹饪大赛决赛赛场上，仙桃参赛选手精心制作的“沔阳三蒸”菜肴荣获特金奖。

2014年，市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沔阳三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2015年3月，“沔阳三蒸”证明商标在国家工商总局注册成功。

2015年4月，首届沔阳三蒸文化艺术节暨沔街开幕式上，中国烹饪协会授予仙桃“中国沔阳三蒸之乡”牌匾。沔阳三蒸博物馆揭牌，馆长陈新云是沔阳三蒸第一支线的第四代传承人。

2018年9月，中国烹饪协会在河南郑州发布《中国菜·全国省籍地域经典名菜、主题名宴名录》，“沔阳三蒸”位居“中国菜”之湖北十大经典名菜之列。

传承不仅仅是继承，还要发扬、创新。2015年，沔阳三蒸协会与武汉商学院联合成立沔阳三蒸研究院。该研究院集聚教授、中国烹饪大师30多位，将深度挖掘沔阳三蒸菜品的研发与创新、品牌的保护与推广，研究制定沔阳三蒸技术标准，力促其品牌

化、规模化、产业化。武汉商学院还开设专门的蒸菜课程，邀请沔阳三蒸“非遗”传承人到校授课，加大蒸菜技能管理人才的培养力度。

沔阳三蒸已成为仙桃市的一个饮食品牌和一张鲜活名片，在推动仙桃餐饮行业和湖北楚菜产业发展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如今的仙桃市越来越重视蒸菜人才培养，截至2018年底，拥有中国烹饪大师10人、湖北烹饪大师15人、湖北烹饪名师20人，形成了一支由四十多位烹饪大师、名师和上百位烹调技师、高级烹调技师组成的实力雄厚的技能人才队伍，为“沔阳三蒸”的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仙桃人民将用自身的勤劳和智慧，把“沔阳三蒸”演绎得更加精彩纷呈。

陈锡椿，原沔阳县烹饪协会（首届）副秘书长、中华沔阳三蒸传承谱系第一支线第三代传承人；郭艳，仙桃市文联工作人员



沔阳三蒸博物馆

“亚洲体操之乡”是怎样练成的

◇ 郭艳

体操，是仙桃最响亮的城市名片。这里先后走出了李小双、李大双、杨威、郑李辉、廖辉、昌雅妮等6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连续4届奥运会获得7枚奥运金牌、6枚银牌。2000年，国家体育总局授予仙桃“中国体操之乡”。2012年，亚洲体操联合会授予仙桃“亚洲体操之乡”，有“世界冠军摇篮”的美誉。

诞生在猪圈里的训练房

1971年夏天，沔阳中学（现仙桃中学）体操班正式开班，丁霞鹏出任教练。仙桃体操事业由此发轫。

这位从湖北省教师进修学校体育系毕业的高材生多才多艺，在任教体育老师之

余，还教过俄语课和美术课，兼任过校团委书记和班主任。当年，在湖北教师学校进修时，钟爱体育的丁霞鹏，尤其痴迷体操。在体育项目中，体操是最难学，也是最难教的。所谓“田径苦，体操难，球类最好玩”。练习体操，对身体条件要求高。它要求运动员有出色的腰部和腿部力量，上肢要有较强的垂悬力和支撑力。对教体操的人来说，不仅要精通各个动作的技术要领，还要能亲身示范，更关键的是要能保证学生的安全。从痴迷体操到体操班的正式开班，丁霞鹏的体操事业之路充满曲折。

20世纪60年代末，“样板戏”风靡全国。沔阳中学排练“革命样板戏”时遇到了困难。《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剧有不少武打场面，演员要有翻、腾、跳、跃的功

夫，能做到这些的只有专业剧团的演员。情急之中，当年负责组织排戏的曾炎煊老师想到，可不可以让丁老师的体操学生来试试？他立即找到学校党委书记左永发，请他批准丁老师出山，带领学生练武打。左书记当即拍板，大胆起用丁霞鹏。

曾炎煊和左永发没有想到，他们的一个请求和一个决定，为丁霞鹏的体操事业提供了契机，也为仙桃体操神话书写了奠基的一笔。沔阳中学的“革命样板戏”在省、市频频获奖。痴迷体操的丁霞鹏当然不会满足于仅为演“样板戏”培养武打演员。他感到机遇来了，为国家培养体操人才是他毕生的理想。于是，丁霞鹏向学校领导提出请求，开办体操班。这一请求得到了左永发的批准。

体操班虽然办起来了，可训练场地、训练器材，一无所有。沔阳中学操场的西边，有个铺着厚厚稻草的沙坑，丁霞鹏带着他的弟子们在沙坑里练习前滚翻、后空翻等体操基本动作。丁霞鹏渴望能有一个稍微像样的训练房，有一批最基本的训练器材，能让孩子们得到比较正规的训练。可是，学校的经费也捉襟见肘，维持正常教学都艰难，哪来的钱投到体操班上。对丁霞鹏来说，只要能干体操，他不怕条件差。他感激也钦佩左书记的开明和勇气，从不向校领导叫苦叫难。

体操班批准办下来后，左书记没有撒手不管。他看见丁老师带着孩子们在露天训练，晴天披一身汗，雨天裹一身泥，琢磨着怎么解决训练房的问题。一天，左书记对丁老师说，带着学生们天天在露天训练不是个办法。学校有间勤工

俭学用过的猪圈，小是小了点，名称也不好听，可毕竟能遮风挡雨，收拾干净，先将就着用。丁霞鹏喜出望外，立即带着学生清理猪粪、垫新土、刷墙壁、铺稻草，把猪圈收拾干净。他还利用自己擅长的美术体在墙上写“严格训练、严格要求”“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有志者，事竟成”的标语。第一代体操训练房就这样在猪圈里诞生了。

“四千”精神创造骄人成绩

1972年6月28日，体操班开班仅一年时间，丁霞鹏率领弟子出征荆州地区体操比赛首战告捷，沔阳中学男女体操队双双获得甲组团体冠军。同年9月，沔阳中学体操班学员丁杰代表湖北参加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少儿体操比赛，荣获男子吊环第3名，自由体操第5名。这支从沙坑训练场、猪圈训练场练出来的队伍，实力不容小觑。校领导当机立断，把用作学生饭厅的学校礼堂腾出一半，拨给体操班用作训练房，体操训练从猪圈搬到了饭厅。



20世纪80年代的体操训练房

丁霞鹏在简陋环境下闯出的成绩，让沔阳县委、县政府领导看到了体操事业的光明前景。1972年，沔阳县正式成立体育运动委员会。1976年，县政府将县工人俱乐部（现仙桃市工人文化宫）划出一半的面积和资产给县体委，把原属于工人俱乐部的灯光球场移交给县体委。1977年下半年，县政府拨转款4.8万元，盖了一座简单的体操房。1978年春，丁霞鹏老师正式调入体委，沔阳中学体操班划归沔阳县体委。1981年，时任常务副县长的舒端仁同志批准县财政拨款8万元，盖起了800平方米的体操训练房。

创立之初，体操班没有一件像样的器材。丁霞鹏把目光投向了一些学生家长——汉江造船厂的师傅们。这些来自武汉的师傅们，热心快肠，心灵手巧。师傅们利用业余时间，帮助体操班自制了单杠、双杠、高低杠、平衡木和一幅可升降的吊环。没有垫子，在地面铺上厚厚的稻草，再盖上演戏废弃的幕布。后来，丁霞鹏用热心体操事业单位赞助的钱，请丝织厂等单位的师傅设计，先后制作了山羊、跳马、海绵坑、蹦床、自由体操台，以及办体操幼儿园需要的跷跷板、溜溜板、秋千等器物。

颜永平，丁霞鹏在沔阳中学的学生，后来成为丁老师在体操事业上的助手和接班人，先后任职仙桃市体操学校（现为李小双体操学校）校长、总教练，几乎见证和亲身经历了仙桃市体操事业起步的全过程。他说：“我们仙桃体操的发展，上世纪80年代在湖北省就开始冒尖，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著名的‘四千’精神（即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万苦、千方百计），不等不靠，不向困难低头。”

发展体操事业，缺这缺那，说到底是

缺钱。县（市）财政用于体操事业的经费是杯水车薪。丁霞鹏、颜永平以及后来调入体校任教练员的彭友平，三代教练一条心，用精神感动人，用嘴皮说服人，用业绩鼓舞人，争取社会各界对体操事业的资助。从城区到乡镇，从党政机关到企事业单位，他们凭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先后向近100家单位寻求赞助20多万元，解决了那个时期训练经费和参赛经费的困难。

那一时期，体操班先后向省跳水队输送了童德荣、鄢小明两位队员，向武汉体院输送了丁杰、肖海涛、丁月、齐利群、黄晓丽、郑顺生等运动员。他们中，有的成了全国跳水冠军（童德荣），有的成了杂技名家（万霁）。从丁霞鹏到颜永平，再到彭友平，三代体操人像一群拓荒牛，一步一步推动着仙桃体操事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



颜永平教练自制的土器材

甘为孺子牛精心育新苗

20世纪70年代初，人们对体操还没有认识，甚至把幼儿体操视为畏途。一次意外“比赛”，更坚定了丁霞鹏要培养出顶尖级运动员的决心。1975年，全省举行少儿体操比赛，要求以地区为单位组队参赛。当时是沙市队代表荆州地区参赛。丁霞鹏不明就里，带领队员到了赛区。大会组委会以沔阳县没有资格参赛为由拒绝接待。丁霞鹏和他的队员们不能进入大会驻地，连进赛场热身的机会也没有。丁霞鹏只好带着孩子们住进了旅馆最便宜的大通间。用一块布隔开男生女生，丁霞鹏守在房门口，靠着墙睡。

他们的这种精神感动了大会组委会，最后组委会同意让沔阳县体操队进入赛场进行体操表演。小队员们的精彩表演，让全省体操界同仁对丁老师的体操班刮目相看。这次“比赛”的际遇给了丁霞鹏启示和激励。体育赛场上终究是以实力论英雄，而不是以行政级别论高低，在小县城照样能干出大名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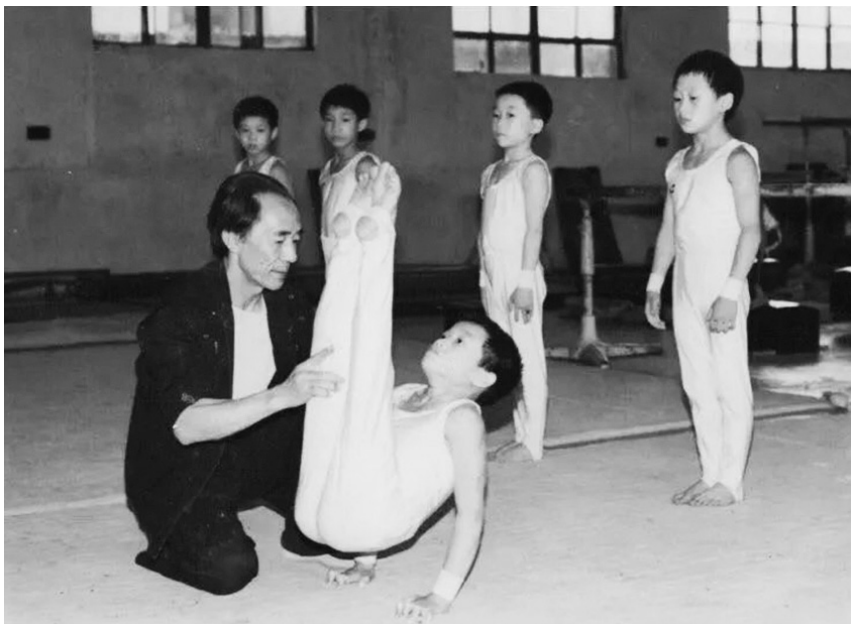
1981年7月，接受正规训练才两年多的沔阳县体操队健儿代表荆州地区参加全省少儿体操比赛，囊括了4个组别的团体冠军和4个组别的个人全能冠军，共获11枚金牌、31枚奖牌，在全省体操界引起了轰动。

选材是体操启蒙教育的基础。丁霞鹏、颜永平、彭友平选材有独特视角，他们宁愿选拔有某种

缺陷但优势突出的苗子，不选那些虽无明显缺陷却资质平平的孩子。1980年夏天，丁霞鹏遇见了李小双、李大双孪生兄弟，发现兄弟俩奔跑速度快，腿部有力量，爆发力强。他注意到兄弟俩的体形，两个孩子都是“O”字形“罗圈腿”，肚子大，肩的柔软性也不太好。丁霞鹏考虑，体形虽不理想，但可通过训练来整形，有力量才是最宝贵的。于是，征得孩子家长的同意，丁霞鹏收下这对双胞胎兄弟为徒。从此便有了三十多年的仙桃体操辉煌。

1985年5月的一天，颜永平和担任教练工作不久的彭友平到新生街小学选材。一个瘦小的男孩进入他们的视线。这个孩子手臂奇长，臂力超群，胸脯厚实，但缺陷也明显，双腿呈“X”形（俗称“外八字”）他们决定收下这个叫杨威的小男孩，由彭友平带他。

选拔郑李辉的过程也颇具戏剧性。1983年6月2日，颜永平到幼儿园选苗子，发现一个机灵得像猴子的小男孩，正嗖嗖



丁霞鹏教练指导杨威训练

往一棵树上爬。颜永平发现这个孩子体轻臂小，上肢有力。对他进行测试，一口气能做十多个俯卧撑，跑起来像兔子一样快。颜永平当即收下这个孩子。颜永平指导训练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郑李辉就达到了国家二级运动员的水平。1985年12月，不满8岁的郑李辉入选湖北省体操队，不到17岁又入选国家体操队。

丁霞鹏、颜永平、彭友平从事的虽然是启蒙训练，但他们的目标是让自己的弟子成大器。因此，根据孩子自身特点，因材施教的同时，格外注重对他们意志品质的磨炼。

丁霞鹏为给李小双、李大双这对好苗子增加训练时间，把兄弟俩接到家里住，照顾兄弟俩的生活，也教文化课。这对孪生兄弟在体操房是有名的“拼命三郎”，胆子大，敢冒险，不怕死。颜永平在训练中，根据儿童疲劳快、恢复也快的生理特点，掌握训练强度和节奏。他对潜质好的苗子实行超前训练，让5岁的郑李辉同7岁的运动员一起训练，一样上强度，一样上运动量，坚持每天3小时，节假日全天训练，郑李辉进步飞快。在彭友平的打造下，杨威成了一名“比赛型”选手，一遇大赛就兴奋，就像战士听到战场上的冲锋号。

从1983年到2000年，在沔阳大道体操房的17年间，春夏秋冬每个清晨，颜永平带着一群七八岁的孩子跑上十多公里。天不亮就跑步的习惯，颜永平从恩师丁霞鹏那儿接续下来。寒来暑往中，就是在这种言传身教和潜移默化

的带动下，培养了一茬茬小运动员吃苦耐劳的优秀品质。在汗水和泪水中，艰难地完成了启蒙阶段的训练，培养了他们不怕困难、敢于拼搏进取的精神。丁霞鹏、颜永平、彭友平3位教练均荣获“世界冠军启蒙奖”。

体教融合时代的育人新态

进入新世纪，仙桃——中国内地的这座小城，因体操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2000年初，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题写“中国仙桃体操之乡”题词，“中国仙桃体操之乡”“世界冠军摇篮”两块金字招牌落户仙桃。从简陋的猪圈到明亮整洁的体操学校，是三十年如一日的辛勤与汗水。2002年1月，仙桃市委市政府投资800多万元，建起了李小双体操学校，建筑面积达6600平方米。2004年10月9日，首届中国国际体操节暨国际体操精英邀请赛在仙桃举行。世界冠军俄罗斯涅莫夫、霍尔金娜，日本富



1984年全省少儿体操比赛中沔阳县获团体甲组第一名（二排右一李小双，右二李大双；前排左一郑李辉）

田洋之，罗马尼亚乌兹卡，中国李小双、李小鹏等45位体操名将云集仙桃。

在北京奥运会上，仙桃市再次创造了“一座小城，两位冠军（杨威、廖辉），三枚金牌，四块奖牌”的世界体坛神话。2012年，亚洲体操联合会授予仙桃市“亚洲体操之乡”称号。

从1972年到2022年，仙桃体操走过50年历程，为国家选拔、培养、输送了大批优秀体操运动员和体育人才。“亚洲体操之乡”这张靓丽的城市名片，在新时代弘扬体育文化、发展体教融合的道路上，激励着这座小城的人们奋勇争先。

2021年，国家体育总局印发的《“十四五”体育发展规划》中指出，加强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体育发展。为愿意成为运动员的学生解除后顾之忧，鼓励各地建立健全“一条龙”体育人才培养体系，由小学、初中、高中直至大学组成对口升学单位，解决体育人才升学断档问题。

李小双体操学校的刘芬与彭友平同为第三代体操教练，见证了仙桃体操的发展和变化。现如今，李小双体操学校倡导的“快乐体操”，一方面让体操运动的形象“改苦为乐”，另一方面也为竞技体操扩大选材基础。这实际上就形成了合理的筛选机制，不同目标、诉求的孩子“各取所需”。体操运动“小力量、灵活性、协调性和平衡感”的特点，可以说是运动的“万能基础”。有不少运动员启蒙于体操，在后来的训练过程里，根据自身因素，选择跨项转行。

在第十三、十四届世界健美体操锦标赛蝉联两届世界健美体操锦标赛有氧踏板



2016年，全国快乐体操比赛（仙桃站）

冠军的王雨寒，5岁进入李小双体操学校学习，9岁输送到武汉体育学院体操队，10岁转项学习健美体操。2022年7月3日，在第19届国际泳联世锦赛跳水项目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中，昌雅妮携手队友陈艺文夺得金牌。昌雅妮2007年就读李小双体操学校，2010年输送到湖北省跳水队，是国家队重点培养的跳板新人，仅用6个月时间就完成了“由台转板”。

在推行体教融合的路上，市体育局推广快乐体操，免费开办教师培训班，针对示范幼儿园免费配备器材。这一举措覆盖全市，旨在扩大培养基数，宣传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诚如两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冠军得主、中国奥林匹克代表团首枚个人全能金牌获得者李小双，在一次采访中所言：“专业人才的培养，不是为了培养世界冠军，是为了下一代，更下一代，创造出出冠军的条件。”

郭艳，仙桃市文联工作人员

“汉裱” 风华

◇ 胡来旺

装裱，我国的一种传统工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它是装裱匠人通过独特的工艺技术，将字画、手稿、信笺、证照等，装裱成立轴、镜芯、册页、手卷，以供人们收藏张挂和品玩鉴赏。特别是，他们能将残缺朽损的物品修复还原，使其重现风采得以存留，为社会发展历程提供难得的实物佐证。



清末民初较兴盛

据中国《装璜志》载，宋代以后随着工商业进步，装裱行业在一代又一代匠人的探索和革新中，不断进步和完善，形成一套流程科学、工艺独到的传统技艺，逐渐体现出时代风貌和区域特点，形成各自风格和流派。

北京城身为皇都，装裱的特点是用料华贵、做工讲究、款式多样，无不彰显皇家的尊严与华丽，其装裱风格形式被称为“京裱”。地处江南的苏杭，山清水秀，文人辈出，旨趣心清意远，装裱多以单色为主清淡雅致，又以苏工细活而著称，被冠以“苏裱”。由此，形成公认的京、苏两大流派，其他区域的装裱技艺深受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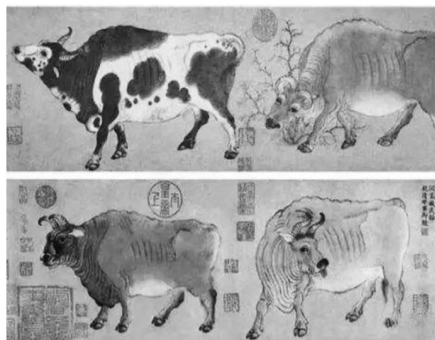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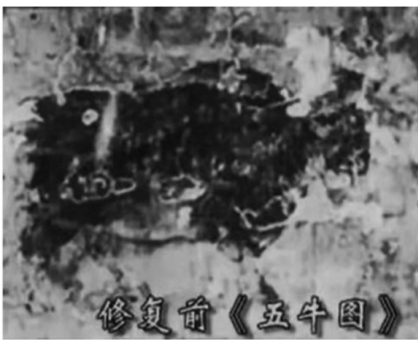
“汉裱”顾名思义，装裱工艺和形式具有汉上特色，它是由活跃汉上的裱师，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融入外师法则而形成的。

荆楚地区在宋代已开设裱坊，襄阳大书法家米芾即精通装裱，他还依据自己的装裱经验撰有多篇文章。由此类推，作为九省通衢的武汉文人云集，装裱业自然不会或缺，只是由于战乱频发、天灾水患，至清末之前鲜有记载而已。

清末民初，汉上的装裱业应是较为兴盛，但并非有人所说，裱画店达到140余家。纵观当代武汉，城市扩展、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居住人口增容、对外交流频繁，都是旧武汉所无法可比的，目前装裱店家（传统手工装裱和机械装裱）包括周边地区在内，粗略统计仅有260余家，当年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多家？以每家店一至二位裱师推算，140家至少应有200多人从业，为何时至今日他们的手艺传承者却很少？可能是将有些承接裱画业务向外发包的中间商也算到其中，



清代的裱师



修复前后的《五牛图》

这从“胡氏装裱”胡宗海之子承接“淳辉阁”业务中可得印证。再或，将从事“红案”的师傅也统计到店家行列了。

武汉解放后，装裱业公私合营，归并为江岸、江汉、汉阳、武昌四家手工装裱联社，从业人员不过百余人，还包括汉口新胜造纸厂、武昌螃蟹岬造纸厂及一些包装盒厂的工人。后者主要从事纸板、鞋盒、食品盒等商品裱糊，与裱画工艺不可同一而论，由此可见装裱店家并没有传言的那样多。

并存发展“三大帮”

民国以前，武汉装裱业大致并存“三大帮”——“黄冈帮”“汉阳帮”和继扬州“米家船”后以胡宗海为代表的“胡氏装裱”。

据汉裱名师胡献文讲述，“黄冈帮”店铺除经营装裱之外，还销售名人字画、仿古临摹和书画材料，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所装裱的字画要求较高。同时，也批量兼营一般字画，以满足有雅兴的市民装点居室所需。故很多店家老板，能写一手好字或画得一手好画，如百岁老人黄松涛先生即是裱画世家出生，少承家学，终成名家。

有的裱师工艺稍粗，以用于民居布置的书画条幅、中堂对联为主，自写、自画、自裱出售；有的经营庙宇道场用来教化信众

的画幅，由于受众广泛，故也生意兴旺，

解放前，社会动荡是百业凋零的重要原因，每遇天灾战乱通货膨胀，物价日变，裱画周期又长，以至头天接活说好的价，几天后买材料都不够，更不谈利润了。有些装裱店难以维系，或停业关张，或收缩乡镇。如一位老法师原本出生装裱世家，自幼习文练字期从家业，由于生意衰落，举家从汉口迁到汉川刘集老街，因父病而家道中落，为了有口饭吃而入佛门。那些曾经活跃在城镇的裱师，因迫于生活而转行，或勉强维持以终老，这也许是“黄冈帮”裱师传承面不大的重要因素吧？

“汉阳帮”又称“红案”，主要经营百姓居家装饰特定用途的物件，销售对象是以汉上为中心的周边城镇乡村，人们惯称为“红货”。

“红案”题材吉祥，如福禄寿禧、平安富贵、松鹤延年、山水花卉等，装裱材料色调喜庆，多以红蜡光纸为芯、花边为饰，装裱成中堂对联，以满足人们对幸福平安的期盼。逢年过节、起房上梁、婚嫁寿诞，均可当礼品恭贺或自家装点，深得百姓喜爱，销量很大。

花楼街曾有一家红货总店，经营红货



1980年代的汉口裱画厂



“红案”中堂对联

专用纸张和红货成品批销。为了垄断市场，老板对红货师傅的生产实行统一管理，年初喝“血春酒”，开利市定数量，发放材料的同时预付部分加工费；年底再喝年酒，清算余款。老板既销售了纸张又保证了货源，而师傅活路和收入都有保障，皆大欢喜。因此许多白案师傅羡慕不已，故在生意艰难时私下学做一点红货，让家人游乡售卖以补贴家用。

由于民众需要，红货一直兴盛延续到1980年代。一到冬腊月，乡城镇街头挂满中堂对联红红火火，还有老先生坐堂舞文弄墨书写对联。那时，黄鹤楼书画社及各地新华书店皆有红货专柜，曹立庵、黄亮等著名书法家都曾应邀写中堂对联。后来，人们审美观念发生改变，加上红货技法相对简单而利润微薄，造成许多师傅转行，所以现在能裱红货的师傅也不多了。

“黄冈帮”“汉阳帮”之外，来自扬州的“米家船”裱画店，以其做工精良、工艺全面、风格清雅，很快占有一席之地。由于“米家船”生意红火，店家又是扬州人



胡宗海

胡炳炎

喜爱甜食，小伙胡宗海沿街叫卖祖传的糯米糖，常在其门廊下歇脚，不时帮店主带带孩子做做杂务。日久得到店老板夫妻喜爱，收为入室门徒学艺数年。

胡宗海艺成不久，由于时局动荡，店主或许思家念亲，举家迁回扬州故土。因此，胡宗海在粮道街开设了“宝晋斋”，沿袭扬州技艺又重艺德，生意很好。张之洞督鄂期间，常因收藏书画手札托胡宗海装裱，有一张洋人赠予的火车头照，因反复观看而损伤严重，为方便晋见慈禧太后（议修铁路），由胡宗海修复一新。吴佩孚在汉时，他的藏品则需过府装裱。张大千，齐白石二位往来于“淳辉阁”（今汉口荣宝斋）期间，字画先是胡宗海承接装裱，后由胡炳炎承接多一些。收藏大家徐行可、关山月、黎雄才，则与胡炳炎的“景苏园”交往密切。

盛时，胡家兄弟子侄及娘舅、旁亲相继入门，历时数十年门徒众多，亦有另立门户开店立业。公私合营后，部分名师归口专业部门，湖北省博物馆聘胡炳炎，武汉荣宝斋聘胡献文，武汉文物商店聘赵兆荣。随关山月进入广州美院的赵四爹，武汉国画院的陈国华、胡运发、樊树堂等，都是从胡宗海“宝晋斋”和胡炳炎“景苏园”学艺而出的高手。

传承自有后来人

1970年代初，国家为了挽救濒危工艺技术，针对名老艺人出台政策，特招其子女为技艺传承人，胡炳炎之侄孙胡长发、胡献文子女胡柳青、胡长青，赵兆荣之子赵锡福等进入各自岗位，成为装裱行中的新鲜血液。

后来，国家放开城乡用工政策，一些装裱艺人的亲属，相继加入装裱队伍，其中有胡献文的子侄十余人，受聘于群众艺术馆、画院、美术学院等开设的装裱室，填补了急需装裱人才的缺口，活跃于荆楚裱画界。他们用自己的双手，为汉上名家名作锦上添花，为抢救修复文化典籍做出贡献。这些当年的新鲜血液，如今成了汉上手工传统装裱承上启下的中坚力量。

同时，国家重视古旧名人字画的修复保护，省内地县博物馆均有学徒选送到胡炳炎门下学习，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展，外国友人对中国艺术品的需求日盛，武汉工艺美术行业组织队伍，以仿古临摹名家字画为主，积极开展对外贸易。由此，将原四大手工装裱联社中的部分裱画师，以陈国华为代表集中到武汉国画院，其装裱形式及质地，得到书画大家李可染的赞誉。

时代进步，社会发展，装裱艺人摆脱旧社会制度的束缚，在各自领域各显神通，汉上装裱更具特色。由于机械装裱、画框装饰的融入，“汉裱”这朵奇葩将更加灿烂夺目、更有传承生命力。

胡来旺，“汉裱”传人胡献文侄儿，来旺装裱艺术工作室装裱师，国家一级美术师

白求恩来华首诊的“五医院”

◇ 麻建雄

爱尔兰教会开设高隆庞诊所

汉阳显正街上的武汉市第五医院（简称五医院），大门原在天主堂对面，那里原有一组教会修女院、医院遗留下的建筑群。

1928年，爱尔兰天主教高隆庞教会在这里开设高隆庞诊所，由美国修女伯爵夫人主持，聘请俄籍医生坐诊。1931年，诊所大兴土木，修建了这一组建筑，共有一栋三层楼、两栋两层楼和一栋平房。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九九医院在伯牙琴台开设伤兵医院，将部分伤员移至该诊所医治，遂成为伤兵医院。

据史料记载，那时诊所只有听筒、血压表、体温表和刀剪之类的简易小器械。一台50毫安的X光机，还是善后救济总署拨来的。

1938年2月，诺尔曼·白求恩大夫和简·尤恩护士来武汉时，曾在该所首诊抢救

伤员，一个星期后去延安。1946年，该诊所更名为高隆庞医院。新中国成立后，先为汉阳医院，后为武汉市第五医院。



1931年刚落成的高隆庞诊所（现五医院体检楼），住满遭受洪灾的灾民

我从1950年代起就住在显正街。五医院这一组临街的老房子是门诊部，隔壁一栋两层楼上，有一个小平台。我和街坊们经常海里海气跑到小平台上玩耍。我们顺着黑色铁扶手的外挂楼梯，经过楼梯边那一扇扇神秘的铁窗，还记得窗户上锃亮的铜质拉手和窗内黑乎乎的阴森暗影。有时，还得绕过楼梯边堆放的药箱杂物，仿佛进入《西游记》故事中的那般惊险和离奇的世界。一跑到小平台上，就特别凉爽，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从小平台透过天主堂高耸的塔楼，往南纵目远眺，是三槐岭一片高低错落黛瓦粉墙的民居，可看到武汉三中的大操场和校舍。远处是南门河改建的“万人游泳池”，以及南门河对岸的鹦鹉洲和洲那边的长江了。

从小平台往北俯览，近处是五医院这组气势傲然的教会建筑群，通过一幢竖向两层楼的青砖拱窗西式建筑，可见到后面还有一幢三层楼房，就是五医院现在的体检楼——它是高隆庞诊所唯一保留下的老建筑，但加了斜屋顶、塑钢瓦成了改良“西式建筑”。屋顶原也是个平台，比小平台更高更大一些。



高隆庞医院旧址，麻建雄摄于2017年

大平台要通过室内楼梯上去，我与街坊们也偷偷溜上去过几次，举目四顾，视野更佳。北边凤凰山尽收眼底，山上的苏式别墅掩藏在浓深的大树林中，半隐半现；西边上了岁数的高大“汉阳树”银杏茂密苍翠，呈现绿幽幽之态，常常惹人神思遐想。

一项成果参加全国科学大会

五医院旁的“汉阳树”让我神思遐想，五医院那些老医生、护士的形象，在我的心中比汉阳树还要高大。现在还叫得上名字的，有儿科钟正培、辛淑华，老中医林聚伍、刘汉民，骨科黄士顺，血液科张锐发，内科蒋德林、戴政德等，他们的那种自信与风骨、优雅与热情、奉献与担当，都给街上们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深深感染着我。

钟医生与我是忘年交。儿时，我母亲牵着我找他看病，后来我又引我儿子找他看病。我五岁多的时候有一次拉肚子，又发烧，父母担心我得了当时小孩最害怕的脑膜炎和小儿麻痹症，到在钟医生负责的小儿科住院，后查出是细菌性痢疾很快治好，他的认真态度和精湛医术，打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1970年代，钟医生常来我工作的汉阳百货商店美工组坐一坐，总是一脸和善的神情，总给我讲一些有趣的事情。他个子高瘦，斯斯文文，智慧清澈的眼神中，透露出职业自信，一举一动都很有派头。他一生奉献给五医院儿科，服务了街上两代们，表现出良好的敬业精神。

1980年代中期，钟医生在重病去世前，嘱咐他夫人一定想办法，把他的一部分骨灰撒在医院儿科他

工作过的那块地方。这个遗嘱还真不好操作，那儿已是在建新门诊大楼的工地。我医院的朋友张汉华帮忙，在夜深人静时，悄悄兜着他的一小瓶骨灰，趁一片月光，撒在正老儿科所在的地基里。当年，找他看病的伢们，现已经是爷爷或爸爸了，钟医生还在那儿护佑我们的下一代。所以每当我走到儿科门诊时，就多了一份与其他人不同的情感。

内科主任蒋德麟的女儿是我小学同学，有一次我谈到她父亲受过较大冲击，还高寿92岁真不容易，一定有什么秘诀。她告诉我，她父亲乐观善良，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牛棚，每天就在他主管的内科扫地、洗厕所、倒痰盂什么都干，用一种乐观心态对待磨难。恢复工作后，由于中青年医生断层，他照样加班加点，忙得不亦乐乎，还参加下乡巡回医疗。有一次，到武汉小型拖拉机厂为职工看病，一天没停歇，中风昏倒在现场。五医院组织协和、同济医生抢救过来，他说一定要坚持锻炼尽早康复，因为病人需要他。后来有私人诊所找上门，要打他的牌子，他坚决不同意，说我没去坐诊怎么行，坚守着一个医生的本分。

1970年代初，五医院门前的街上，常常见到三三两两面色蜡黄或苍白的病人。街上伢们蛮怕，碰见他们就躲得远远的，听大人悄悄议论，这些人得的是什么再生障碍性贫血。五医院采用硝酸土的宁治疗，取得明显成效，在全国都有点名气，不少病人是老远慕名而来的。五医院大门口的宣传栏上，常贴有治愈病人的感谢信。

1978年阳春三月的一天，医院敲锣打鼓大门口站满人，原来是欢迎该院治疗此病的血液科医生，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凯旋。这项成果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是该院首项通过鉴定的重大科研项目。

从广播听到白求恩来过高隆庞

新千年的一天，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首先传入了五医院副院长罗宇的耳中。他早上收听武汉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突然听到白求恩当年来武汉时，曾在高隆庞诊所首次诊疗抢救伤员。得知这一消息后，经医院多方查找，发现报道来源于我国著名外交家王炳南的一篇回忆文章。

抗战初期，王炳南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工作，负责接待白求恩，并按周恩来的指示，执行了安排白求恩去延安的任务。数十年过去，王炳南到加拿大访问时，特意寻访到了白求恩的助手、女护士尤恩。尤恩写有一本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岁月》，王炳南深知它的史料价值，爽快答应资助在中国出版，于是这段史实公之于世。

白求恩是加拿大著名胸外科医师，为北美洲四大名医之一。他从斯诺《西行漫记》、史沫特莱《红军在长征》等美国左翼作家的著作中，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努力创建的理想社会和军队的英勇战斗事迹。在美国的一次庆祝活动中，他与中国教育家陶行知相遇，被陶行知慷慨激昂的演讲所感动，于是毫不犹豫地表示：“如果需要，我愿意到中国去！”他的申请被接受，受加拿大和美国和平民主同盟等组织派遣，他组成的医疗队来到中国。

1938年1月8日，白求恩购买了充足的药品和器材，携助手兼翻译尤恩等，乘“亚洲皇后”号海轮，从温哥华港启程，经香港于2月7日下午飞抵武汉。史沫特莱把白求恩一行安排在汉口鄱阳街34号，一家圣公会教堂主教住的小楼里。

次日，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王炳南，



白求恩在抢救伤员

安排白求恩一行会见了周恩来。白求恩向周恩来强烈要求马上到前线工作，但因武汉正遭受日寇轰炸暂不能走。在武汉的半个月中，白求恩和尤恩到高隆庞诊所工作了一周时间，用带来的药品和器材救治伤病员，挽救了众多生命。

尤恩还有个美丽的中文名字——于青莲。她的父亲是加拿大共产党早期著名领袖之一，她辞去工作与白求恩同行。后来，她回到加拿大写了回忆录，书中详细描述了白求恩在高隆庞诊所救治伤病员的情况：“到武汉的第二个星期，白求恩来到汉阳的一所教会医院，冒着生命危险与医疗队成员一道抢救伤员。候诊室里挤满了上次空袭时受伤的人员，整个大厅里放满了自制的担架……白求恩大夫忙于截肢、止血、取出弹片等等，血腥味钻进鼻孔，长时间去不掉，但当时，我们都顾不得这些。”这期间，白求恩和尤恩，还多次冒着日本飞机轰炸的危险，出诊医治伤病员。

后来，在周恩来的安排下，白求恩和尤恩于2月22日离开武汉，辗转到达延安，

第二天就受到中共领袖毛泽东的接见。后来，白求恩率医疗队辗转山西五台山等地，为中国抗日军民服务，医治受伤的抗日将士。白求恩在战地医院抢救伤病员数千人，亲自开刀动手术逾千例。创造了69小时连续做115例手术的记录。不久，他不幸因手伤感染以身殉职。为此，毛泽东写下了著名文章《纪念白求恩》，称赞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发现白求恩在高隆庞诊所的往事，实际发掘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白求恩来中国救死扶伤的第一个地点，白求恩的这一周无疑成为我们城市历史的一部分。

2010年7月30日，五医院在高隆庞诊所旧址上，建了一座白求恩纪念馆，它是继石家庄和保定唐县之后，全国的第三个白求恩纪念馆。

纪念馆以“医德医风教育”为主题，武汉市新入职的医护人员，都要在执业前到这里宣誓，接受白求恩精神的洗礼，成为穿上白大褂的“第一课”。目前，已有上千名医护人员在此开启职业生涯。裘法祖、桂希恩、王争艳等全国著名医生，首批入选白求恩纪念馆的“好医生”榜。

五医院如今已成为学科门类齐全、设备先进的现代化综合医院，正在进行新的扩建。高隆庞诊所旧址、白求恩纪念馆、白求恩雕像，也将在汉阳古城风貌区的建设中完善提升，成为重要组成部分。

不久，五医院这所历史厚重、开拓发展的医院，也将迎来它的百年华诞。

麻建雄，武汉市摄影家协会主席，市政协第八、九届委员，汉商集团原总经理

最是书香能致远

◇ 梁 星

人物名片：梁星，汉阳区政协委员、民盟汉阳区工委副主委、汉阳区图书馆副馆长。

我是一名文化工作者。从文化馆到图书馆、从戏剧编导到图书管理、从幕后到台前，大学毕业后的这十年，我扎根基层，深耕汉阳，把青春与激情奉献给了公共文化服务事业。

过去的一年，是我的转折年。这一年，我调至汉阳区图书馆任副馆长，这一年，我也成为了一名汉阳区政协委员。初入政协，就嗅到了熟悉的书香。全国范围内开展的“书香政协”系列活动，为委员们创造了围坐畅言、在头脑风暴中碰撞思想、在交流交

融中深化友谊的平台。这对我而言充满了吸引力，我更想将其与本职工作进行融合，从“全民阅读+”的角度出发，积极响应全国政协的“书香”号召，令书卷常开、书香常伴。

阅读启发人生价值

在“转折年”到来之前，我的工作重心在于不断创新文艺形式，配合做好党的理论政策宣讲，持续创作优秀舞台文艺作品。我深知，要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思想，并贯彻落实到演出、宣传、辅导、服务、创作的全过程中，才能使之成为政治上的主心骨、思想上的定盘星、行动上的指南针。



作者在“一见倾心是汉阳”央媒、大V推介会上宣讲《人文汉阳》

“学而时习，是嫦娥天宫气定神州，是蛟龙入海壮志已酬，是北斗导航探索无垠宇宙。学而时习，是万物并育的绿水青山，是主场外交的大国风范，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交口称赞。”随着悠扬的配乐响起，诗朗诵《初心》又一次随着“武汉之夏”系列惠民演出活动来到了老百姓的家门口。

这是我新近创作的一件文艺宣讲作品，借助朗朗上口的现代诗句和接地气聚人气的表演形式，将各类理论宣讲内容变为汉阳人民耳熟能详的“流行曲”，让阅读变得轻松活泼、多姿多彩。

这几年来，我累计创作湖北大鼓、诗歌、快板、小品、情景剧、歌舞等形式的节目七十余个，深入街道、社区、学校、企业开展宣讲活动近三百场，让老百姓们“望得见旗帜、听得见民生、看得见繁荣”。其中，既有反映汉阳在新时代繁荣发展的诗歌《兴邦》《红色汉阳·峥嵘印记》《花 YOUNG 汉阳》，又有歌颂汉阳聚焦深根工程、人民共享美好生活的群口快板《志愿服务点点歌》《深根里的一抹志愿红》《聚沙成塔》《我

们都是答卷人》《武汉之夏·相约汉阳》等。

除此之外，我用传统的湖北大鼓《大爱传奇》，讲述汉阳好人陈春芳的感人故事；编导小品《谢谢你》，演出退伍军人的家国情怀；创作歌曲《永远的记忆》，唱响与疫情赛跑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担当；导演舞蹈《汉阳造》，跳出近代工业的国之坚守……这些文艺作品在群众文化领域政府最高奖“群星奖”中屡获殊荣，通过不同的形式将汉阳声音传递到全国。

通过近几年的理论宣讲和群众文化工作实践，我深刻认识到，文艺理论宣讲是链接理论与实际、政策与群众的桥梁，既有阳春白雪的风雅，又有下里巴人的地气；既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也是“确保党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关键。我将自己阅读研习党的思想理论的所思、所感、所悟，通过各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表达、传播、扩散，这又何尝不是一种“全民阅读+”效应呢。阅读之于我，不仅是群众文化的再扩散，更是人生价值的新启发。

阅读助力双岗建功

进入新的角色后，推广全民阅读、参与“书香政协”建设则成为我的新目标。在这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关口，我从基层文化工作者转变为管理者，对我来说不仅是机遇，更是挑战。

2021年以来，我秉承传承经典、知音共鸣的理念，加大全民阅读推广力度，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

人心，推动汉阳区全民阅读系列活动深入开展，着力培根铸魂，深植“阅读种子”。为营造良好文化氛围，我策划开展了“读你读我读汉阳”2022年汉阳区全民阅读月系列活动。

从“十山六湖”的资源禀赋，到“高山流水”的动人传说，从“一心引领、两带联动、五区协同”的汉阳文旅发展空间布局，到“一山两园三湖四馆五节”的现代化知音之城建设，全面创新概括了“开卷有益，益己、益人、益民族；读书有利，利国、利民、利天下”的全民阅读理念，并以老、中、青三个年龄段为界，利用“3+1”的短片形式进行线下共读、线上传播，形成阅读推广浪潮。

同时，我与区委宣传部、汉阳市政等职能部门积极沟通对接，联合推出“汉阳十景”系列书签，融合汉阳大美风光和经典书目推荐，与市民读者共品书香汉阳。

船的力量在帆上，信仰的力量在书上。通过开展全民阅读推广工作，我深感肩上责任重大。作为一名文化工作者，不遗余力地挖掘展示汉阳历史文化底蕴，唤起公众文化自觉，打造书香汉阳新形象。

2022年，汉阳区倾力打造“阳小驿”户外工作者服务驿站，区政协创新开展“政协委员进基层 知音圆桌在一线”系列活动，号召全区政协委员走进“阳小驿”亮身份，让上千名居民群众与政协委员成为“好友”。

为配合全市持续推动委员读书活动走深走实，促进汉阳区图书馆与区政协增强合作共建，我与区政协文史委、办公室积极沟通联系，计划利用“阳小驿”建设流动图书阅览室。

我们在馆内精心挑选了涵盖红色党史、中外经典名著等类别在内的图书600册，分装打包，投放到区内部分“阳小驿”，供群



作者（右一）代表汉阳区图书馆向汉阳区“书香政协”阅读点提供流通书籍

众免费借阅。人民群众与政协委员能共看一本书，现场交流读书感悟，在书卷墨香中同频共振、凝聚共识。

我们将读书平台向社会开放，充分发挥“书香政协”的辐射效应，让全社会感受到具有浓浓政协味的书香气，助力营造书香社会氛围。全民阅读+“书香政协”，广泛凝聚着建设宜居宜业新汉阳的精神力量，为建设现代化大武汉增添奋进力量。阅读之于我，不仅是实现双岗建功的必要途径，更是实现价值的风向标。

最是书香能致远。作为一名公共图书馆负责人，我将继续发挥“网”的优势，下足“导”的功夫，增强“群”的引力，全力助推“书香政协”系列读书活动持续深入开展。

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将在读书活动中形成“我要读”的自觉，在阅读中加强平等互动交流，推动读书活动成果转化，增强社会溢出效果，不断增进人民文化福祉，为做好政协各项工作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

把读书作为履职的必修课

◇ 赵 起

人物名片：赵起，洪山区政协委员、民进洪山区工委副主委、武汉数字创意与游戏产业协会副会长、武汉华文互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董事长。

阅读好书，让我“躬身入局”

有人说，武汉是英雄的城市，这大概始于1911年的武昌首义。

为了探究这句话的真意，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学习和了解那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特别是1910年暴发于东北的鼠疫。

我了解到“中国防疫事业第一人”伍连德的故事，他临危受命，毅然前往东北，领导了一场由中国人主导的国际防疫行动，成功地扑灭了数百年不遇的大瘟疫——这故事带给我特别大的震撼，也成为我未来抗

疫之路的重要精神源泉。为此，我还特别拜读了王哲先生的《国土无双伍连德》一书，这占据了我2019年相当一部分的业余时间。

谁知书还没有完全放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来，所有武汉人被迫放了一个长达76天的假期。

开始封控管理的第二天，我就报名了志愿者。亲友表示担心，但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武汉与110年前的东北何其相似。国难当头，不仅仅需要八方支援，更重要的是设法自救。那到底如何才能自救？关键就在于躬身入局！哪怕是一点点的努力，能多让一个人早点去医院，能多让一个家快些分到食物，能帮社会把焦虑降下来，能帮政府把秩序稳定下来，那都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无愧于党和人民。

面对未知的病毒，恐慌是必然的，临

出家门，我还有一种莫名的悲壮感。但走进志愿者行列，我就振奋了，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像我这样的志愿者，越来越多。一天天过去，随着抗疫经验的积累，武汉也越来越有秩序。因此，在疫情还没有结束的时候，我就深信，武汉一定是有救的，武汉必然战胜疫情！

这76天，我亲眼见证了武汉人是如何从恐惧、悲观到最后走出阴影，并且越发坚定和自信的心路历程。这个时候，我也才真正对“武汉，是英雄的城市”这句话，理解得更加透彻。

武汉抗疫的76天里，我白天做志愿者，晚上读书。读完了《范仲淹与庆历新政》以及很多宋代文人的书籍，宋代官场的那种“忧乐为天下”的济世情怀再一次震撼了我的心灵。宋代文人那种“为往圣继绝学”的宏大气魄，也在我的心底播下了种子。

探寻文化，让我重识武汉

武汉的城市活力，用一句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话，就是“每天不一样”。是的，“每天不一样”，这种生生不息的变化，磨砺出武汉人“处变不惊”的胸怀，因此能够从容度过类似于2020年这样的“新冠大考验”；但也正是这“每天不一样”的快速变化，让我们对时代的记录变得更有价值。基于这个认知，我探索了一

段真正的文化苦旅路。我想为这座城市做点什么，决定从深入了解它开始。

网上的知识虽然庞杂，却也非常碎片化，难以解渴。为此，我特意找朋友去借了一本《武汉通览》，然后置于案头，时时查阅。应该说，《武汉通览》也不是一本深度讲解武汉的书，但非常全面，从地理、历史、文物、民俗、工业、商业、交通、教育和文化等16个方面，收录了4400多个条目，这就为我系统地了解武汉拉出了一个大纲，非常实用。

但是在网上整理资料的时候，我又发现一个问题，深入浅出讲述武汉的内容还是偏少。这给我的学习增加了相当的难度，但也正说明市场有空白。

由此，我发现自己有事可做——那就是讲述武汉的地方文化，以时下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方式，比如短视频和短文案，把那些历史上存在过的高价值知识，以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再生产一遍，在注重知识严谨性的同时也注重落地的趣味性。这就是我未来要做的事，也是能把我的职业、兴趣与读书结合起来的最好方式。

在“书香政协”的读书活动中，我有



在工作间隙翻阅、学习《武汉通览》

幸结识了著名的“武汉通”万学工老师。这可是一本活字典，他为我们宣传武汉的工作提供了大量的顾问支持。

“为往圣继绝学”，是宋代文人的宏大气魄，也是天下读书人的梦想。当然，也是我成立华文互娱的初衷和使命。在我的强力坚持和身体力行之下，我们的创业团队转变思维，变成一支了解武汉的学习班，也成为一支宣传武汉的行动队。读书带给我们团队的是，对内可以充实自我，感受城市底蕴，把平凡的每一天过得更有滋味；对外则充满正能量，可以宣传武汉的城市历史文化之美。内外兼修，相辅相成，让团队变得更加有成长性。

唯有读者知其味，唯有书香沁人心。读书所给予的正能量，我们多元化、多渠道地传递出去。“书香政协”建设影响到的不止政协委员，更包括他们所代表和辐射的各行各业千千万万的群众，促进“书香社会”建设应成为每位委员履职的自觉与自发。

鉴古知今，助我履职增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我深以为然。

读书是手段，履职是目标。2020年4月，委员读书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我积极参与各项活动，认真听取辅导报告，并努力将其精神融入到自己的日常工作之中。

在带领团队考察武汉历史文化的过程中，位于洪山区的老人桥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它竟然是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遗址。据《武汉通览》，“约在距今6000—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就有原始人群生息于今武汉市洪山区老人桥等地区”。老人

桥遗址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和盘龙城遗址的发现时间差不多。在当时的考古现场，发现了相当数量的石器和陶器，形成了高出周边地形4—5米，面积约9000平方米的高地，研究价值突出。

从综合利用的角度来说，老人桥遗址可能是武汉城区“混得”最差的文化古迹了。它没有话题性，也很少出现在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里，似乎像不存在一般。它就在处于闹市之中，虽落寞，却又不争不抢。

然而，按照《武汉通览》的记载，这里要远早于盘龙城，也远早于纱帽山。如果记载属实，那这儿是武汉人的起源地，是武汉人的“根”。老人桥遗址有着相当深厚的文化价值。

2022年8月，我向有关部门提出了《关于合理保护老人桥遗址并建设老人桥遗址公园的建议》，希望政府能够通过以保护武汉人的历史文化遗迹为抓手，更好地打造对外宣传的窗口，展示武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

阅读，让我增强了履职服务能力，使我提案建议的思路宽阔、有的放矢。与过往相比，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政协委员履职的要求，所提的每一条建议，都要有理论依据支撑，有脚步丈量、实地探访的真实情况，提出面向现代化建设全局、符合新时代特色、切实反映群众呼声，科学实在、可行性高的建议。

如今，恰逢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武汉奋进新征程之时，正是我们这些读书人大有可为的时代。让我们知行合一，躬身入局，为建设“书香政协”而读书，为促进“书香社会”建设而读书，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读书吧！

一名工程兵的科创理想

◇ 王剑（口述） 严濂（整理）

人物名片：王剑，湖北省山东商会理事、武汉合道通信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

我曾是一名工程兵，这是我引以为傲的人生底色。从部队到政府，从民企到央企，从创业到创新，这些宝贵的经历都是我的人生财富。我试着描述和记录一些细碎过往，由此展开一个关于科创的小小理想。

一段军旅过往

武汉街头丹桂飘香，阵阵幽香把我的思绪带回到我的家乡日照，带回到泛着微微桂香的部队大院。从小我就喜欢在院子里，看战士们排着队在木马上进行飞跃练习。他们还经常带着长枪，训练匍匐前进和翻滚等

战术动作。这些场景历历在目，深深影响着童年时期的我。

爷爷的战友常来家里找他聊天，依稀记得他们说起，面对日本鬼子的扫荡，战士受伤以后缺医少药，躺在病床上只能让伤口自然溃烂，直到弹片掉落下来。抗美援朝战场上，牺牲战士的遗体像麦田里刚收割的麦捆儿，漫山遍野都是……之后，往往是长久的沉默。

本是民办老师的父亲循着爷爷的足迹参了军，讲起部队生活，脸上总洋溢着一份赤诚的喜悦。他常说，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当时我就想，一定要穿上军装，去感受一下火热的军营！祖辈和父辈的经历，是我军旅基因的来处，其中饱含着他们对我的期待。

参军入伍期间，我在原总参二部、湖北省军区 75310 等部队服役，还曾荣立三等功。我非常坚定自己当初的选择，觉得没有白来这一趟！从每个战士的日常行为，头发指甲怎么剪，衣扣怎么扣，到三观如何树立，如何寻求自我发展回报社会……相当于又回炉熔炼，成就了更好的自己。

后来过了一段连队生活，发现自己对身边的军官特别向往。他们不仅身着更帅的军装，还拥有更高的军事素养和思想觉悟。于是人生又有了小目标，我把以前的课本找回来拼命地学，终于考上了理想的军校。

很感谢部队的栽培，让我有机会先后于国防科技大学工程兵学院工程分队指挥专业、南京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军事情报学专业、南昌陆军学院政工专业参与学习。记得当时去南昌陆院，我打着背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沿着红军小道重走长征路到井冈山，特别有仪式感。一路走来，既是回顾历史，又是精神历练。

军校的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让我大开眼界。印象最深的是当时美军海外战争给世界军队演示现代战争的样板，战争中的科技军力让我感到震撼。之后我就天天泡图书馆里，不断学习阅读各种书刊，对科学技术中的新老三论和经济学方面的书籍尤其感兴趣。现在想来，这些美好的阅读时光也为我后来从商和科研打下了理论基础。

这一段军旅过往，不仅让我积累了大量过硬的专业知识，还让我看到了科技力量的无限可能性。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提升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从那时起，我开始萌生了科创兴国的理想。



作者在军校读书

一份岗位职责

命中注定和武汉有缘，先前服役的部队驻地在武汉市，在这里遇到了我的爱人。结婚生子后，我从部队转业到山东省日照市岚山区执法局。两地分居了三年，孩子不能长期缺失爸爸，我就申请参加了考试，竞聘上岗担任日照市岚山区招商局驻武汉联络处主任。

在浙江杭州参加了商务部的培训后，我就带着一份热情和嘱托回到武汉。刚开始，我们也没有师傅带，全靠一双勤脚板，一副热面孔。结合我们市区的招引精神，听到风声就去，找到线索就跟，慢慢有了起色。打听到黄石东贝集团是我们日钢 EPS 产品的潜在大客户，费尽周折对接上了，成功建立了良好的供需关系。

慢慢的，我开始逐渐熟悉政府工作的行政管理流程和经济部门工作的运行机制，也逐渐具备理解识别智能行业需求的设计、归纳与实施能力，共享与整合各方信息资源的沟通协调能力。

2009年，各地搞基础设施建设，我加入了高速公路这个行业。直到2015年，我都供职于武汉智强科技有限公司，担任项目经理。在民企工作，不得不接地气，创新是基本能力，要想在市场中活下去，对人对岗位甚至要求全能。

有了这5年的历练，2017年我通过社招进了中国信科集团武汉长江通信智联技术有限公司，担任工程经理。当时我负责整体深化设计的落实和施工指导。开着车全省跑了几遍，实施地域涉及平原、山地、湖泊各种地形。从麻城试验段到全省高速路网，对各个桩号的选点、布设、设备安装及调试先行和落实。工作过程中，我学习并熟练掌握了系统集成、智能交通、机电工程，以及通信、收费、监控设备三大系统的采购、安装、维护知识。

政府单位的经历让我养成了处变不惊、有条不紊、遇事不乱的“三不原则”。民营



2009年参与取消省界收费站工程

企业的经历让我从另一个角度深入了解市场，为我打造了沉稳的性格和良好的心态。科技公司的经历开拓了我的视野，让我意识到从云计算到人工智能的应用，正以全面创新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未来科技的发展将为各行各业带来巨大价值。这每一份岗位职责，都让我学有所获，也越来越希望通过科技和创新的力量去实现我的理想。

一个科创理想

实践出真知，多次深度参与重大项目的立项、申报、实施、运营投产的全流程使我拥有了丰富的实操经验，也让我拥有了实现理想的底气。

2019年，我在武汉创办了合道通信科技有限公司。“志同道合”依着古人的念法，从左往右是合道同志，我就取了前面两个字。合道，有合作道路之意。通信是个广义的概念，既表明从事科学技术行业，又有沟通诚信之意。

我们公司主要从事高速公路及隧道智慧交通系统（ITS）技术研究、方案设计、工程施工、系统运维与集成等业务，是一家技术驱动型企业。这些年，我们与地方政府、央企、国企合作，参与了许多重点项目。

机电、通信、收费、监控系统智能化项目的合作涉及鄂西高速、京珠高速、大广南高速、汉十高速、黄黄高速部分路段及隧道。智慧高速打造了“环省、环路、环站”立体防控网络，有效的服务了群众出行和经济发展。其他的重点项目包括湖北路桥集团恩施区域项目部施工，汉十高铁通信迁改项目，广西南宁市青秀区、邕宁区平安城市建设施工，河南周口平安城市建设施工，钢铁小镇智慧园区建设，湖北省高速公路智能

交通治安防控平台，湖北省高速公路取消省界收费站建设工程及宁波绕城高速提质改造工程。其中，湖南永州水电站的建设项目受到过央视的采访和报道。

2020年，在湖北武英高速公路路段，凤凰关隧道、濛濛山隧道由我们参与完成了LED节能照明改造，全面替换能耗高、亮度不均匀、维护费用贵的老式高压钠灯。两隧道照明节能改造后使用LED灯具照明并辅助先进的按需照明控制手段，可以大幅度减少隧道照明用电，实现绿色智慧管理的目标。实际使用数据也证明，已完成节能照明改造的隧道能耗值降低50.9%。而且隧道内部光线更加柔和均匀，不仅消除了视觉盲区，提高了行车安全系数，还大大降低了运营成本。

多年积累的工程项目经验告诉我，在危化环境、动火作业、狭小空间进行人工巡检，不仅消耗人力物力，存在巨大安全隐患，而且效率低下，对数据的采集和评判也较为粗泛。经过长期的理论研究和市场调研，我认为智能巡检机器人是安防智能化、立体化、移动化的最佳载体。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我们公司开始加大研发投入，组建新的技术团队带领公司进入一个新的业务领域——智能巡检机器人。

智能巡检机器人是新型服务机器人的一种，主要用于生产设备的监测，及时在系统端进行设备状态反馈，以便技术人员实时查找问题并进行维护。据相关统计显示，2018年至2020年中国智能巡检机器人市场总需求约为477亿元，年均需求约159亿，预计智能巡检领域未来可达千亿元市场规模。随着人工智能逐步与传统产业结合，物联网、云计算、5G技术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产业端重组升级，智能机器人技术也迎

来加速进步。当前，自动化、智能化的巡检机器人可谓是生逢其时。

最近，我通过各种渠道探访物理学、自动化控制、计算机、机器人工程学等领域的多位知名专家学者，组建国内研发团队，并与德国相关领域专家合作研发智能四足机器人（机器狗）。目前，已在液压系统、金属骨骼、机器视觉、数据采集、测温、防火、防烟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我们团队与北斗产业园合作，机器人的定位、传感等关键元器件均使用北斗技术，为解决国外技术的“卡脖子”问题而努力奋斗。和竞争对手相比，我们的产品定制更加灵活，拼的就是定制研发和售后服务。

现阶段我们与中核等集团合作，已将产品在山东烟台投入实用。我们团队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不仅可以在危化环境、放射环境、高温环境、地下空间内作业，巡检结果也数字化、实时化，极大提升了巡检效率和准确度，还有效节省了巡检成本，为企业科技赋能，提升了企业整体的智能化运行水平。下一步，我们还将持续增加研发投入，用不断迭代升级的智能机器人产品为我国智能制造事业作出更大的努力和贡献！

科技兴邦，实业兴国，我的理想从未改变。这理想萌发于那火热的军营，根植于我热爱的土地，生长于我每天的日常。科创兴国不只是纸上谈兵，从我做起开始行动，哪怕只是点点微光，汇聚起来也足以照亮前行的道路。

城市规划专家孙宗汾的不凡人生（下）

◇ 张智海

投身武汉城市规划建设

自1946年秋，孙宗汾从北平老家来武大继续学业，就喜欢上了武汉这座城市。后来，他从报刊上看到有关三峡工程构想和长江大桥初步研究的报道，更是大受鼓舞，期冀毕业后学以致用，为建设大武汉效力。

1953年国家启动“一五”计划，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号召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归队，孙宗汾便申请从市青联调入城市建设委员会，此后在不同层面从事城市规划建设近40年，前20余年与鲍鼎先生一起共事。

鲍鼎（1899—1979）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建筑教育家，与梁思成齐名，在学

界享有“北梁南鲍”之盛誉。鲍鼎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后任中央大学（今东南大学）工学院建筑系主任，1945年出任武汉区域规划委员会秘书长兼规划处长。1949年拒绝去台湾，留在武汉迎接解放。新中国成立后，鲍鼎历任武汉市建设局长、城建委副主任、规划委员会主任等职，在1958年4月召开的武汉科技界“大跃进”誓师大会上，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鲍鼎之于孙宗汾，既是领导又是师长（鲍1947—1949年在武大土木工程系任兼职教授主讲建筑学与城市规划）。

孙宗汾与鲍鼎一起工作，耳濡目染，受教良多，对鲍一向怀有深深的敬意，1987年6月15日在《长江日报》发表《忆鲍鼎老师》；1999年（逝世前一年）撰《鲍先



1958年4月，毛泽东主席在武汉接见鲍鼎

生与武汉城市建设》（载《华中建筑》2004年第B07期），缅怀鲍先生的学问、人品和贡献。

城市规划，是一定时期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蓝图和实施建设管理的依据。武汉1927年建市，至1949年先后做过五次都市建设计划，其中以1946年由鲍鼎主持制定的《大武汉建设计划》较全面，对武汉城市功能、性质定位和开发建设远景等，都作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虽因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施，但对后来的城市建设影响深远。

武汉解放后至1988年的39年间，编制过六次城市规划，从初期的“规划草图”到后来的“总体规划修订方案”，一次比一次更完善、更切实。鲍鼎是前三次规划编制的实际主持人，而孙宗汾则由最初的参与者、业务骨干成为后来的主要组织领导者。1996年版《武汉市志·城市建设志》“城市规划篇”，记载了鲍鼎、孙宗汾在六次规划编制工作中所处的地位。

1953年《武汉市规划草图》编制，实际由鲍鼎（市城建委副主任）主持；孙宗汾刚调入市城建委，未能参加。

1954年《武汉市总体规划方案》编制，实际由鲍鼎（市城建委副主任）主持；孙宗汾（市城建委规划处副处长）在参编的21名主要工程技术人员中排第三。

1956年《武汉市十二年规划方案》编制，鲍鼎（市规划委主任）主持，孙宗汾（市规划委规划处副处长）在参编的10名主要人员中排第一。

1959年《武汉市规划（修正草案）》编制，主管领导张珉（市基建委副主任）等3人，孙宗汾（市基建委规划设计室工程师）在参编的10名主要人员中排第一。

1982年《武汉市总体规划》编制，主管领导刘正平（市城建委副主任）、孙宗汾（市规划局副局长）等3人。

1988年《武汉市总体规划修订方案》编制，主管领导孙宗汾（市城建委副主任）、陈锡森（市规划局局长）等3人。

长期的工作历练和积累，使孙宗汾成为一名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的城市规划专家。

孙宗汾认为，城市规划必须遵循国家方针政策，坚持从实际出发，留有余地，处理好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需要与可能三个关系，兼顾社会、经济、环境三个效益，科学谋划合理安排。他参加和主持过许多重大工程项目规划，多能提出中肯见解和可行意见。

解放初期，鲍鼎组织拟定汉口解放大道工程规划方案，提出路幅宽60米，遭到一些人的质疑和反对，认为太浪费土地，甚至被批“好大喜功”。孙宗汾作为规划部门负责人和鲍鼎的工作助手，多方解释据理力争。事实证明，这个规划方案是极具远见的。

在国家重点工程武钢规划选址初期，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一种认为应该靠近大冶铁矿放在黄石下陆，一种认为应该靠近城市放在武汉青山。孙宗汾代表市里参加选址，发表意见认为选址青山有三大优势：一是靠近城市可以获得劳力、生活等多方面支援，二是濒临长江主泓有利解决工业用水，三是这里具有良好的地质条件。他的意见受到重视，提供上层决策参考。

参与重大项目论证协调

当年，武汉石油化工厂的选址也存在争议。最初湖北省领导强调战备不同意在武汉建厂，石油部则强调石油运输要靠长江（油轮），双方意见相左。后经协商，将武钢一处油库用地作为石化厂选址，由于场地狭小发展受限，还影响武钢和青山船厂，孙宗汾认为这是决策欠当所致后果，教训值得汲取；规划决策是政府行为，但凡关系国计民生和地方经济发展的重大项目，都应慎之又慎，瞻前顾后，综合平衡，充分论证，优化方案。改革开放后二三十年里，武汉天河机场、汉口火车站、长江二桥等重大工程相继实施建设，孙宗汾都以不同方式参与规划审查而尽职尽责。

深入、细致和务实，是孙宗汾一贯的工作作风。1953年3月孙宗汾调入市城建委，在测量队任队长半年后，任办公室副主任。为尽快进入工作角色，他花费大量时间查阅

规划建设历史资料，同时带领专业人员深入各地考察踏勘，将市政基础设施现状和土地资源等绘制成册，为不久制订《武汉市总体规划方案》提供依据。

参加武钢〇七工程规划建设，是孙宗汾几十年规划工作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时光。1970年代初，我国钢铁企业只能生产“黑大粗”钢铁初级产品。为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决定投资6亿美元，从日本、西德引进成套设备，由武钢新建包括二炼钢厂连铸车间和热轧、冷轧、硅钢厂在内的一米七轧机工程（又称〇七工程），这是我国钢铁工业史上的大事。为此，湖北省1974年7月成立〇七工程指挥部，武汉市也相应成立支持〇七工程建设办公室。时任规划处处长的孙宗汾成为市城建委派驻〇七工程的代表，负责与主体工程配套的道桥、供水、供电等市政公用工程的规划、审批与协调；授权“从单项工程规划选址、勘测划线、征地拆迁，凡是孙宗汾签字同意的文件和图纸资料，市城建委都认可盖章。”

孙宗汾深知事关重大工作复杂，以满腔热忱全力以赴，认真做好每项工作。重要分项工程的规划踏勘、方案论证直至拆迁动员，都亲力亲为，没有出过任何纰漏。下工地就骑自行车，去市里开会或回机关办事则乘轮渡挤公汽，四年如一日，直到工程建成投产。

1989年3月，孙宗汾卸任市城建委副主任，出任市人大常委会城建委主任。由于他的专业威望，市里有关重要活动和研究重大工程规划问题，仍要请他参加，他也一如既往地积极发表意见。笔者查阅当时的工作笔记，1991年5月29日记载：王守海常务副市长在市府903会议室，听取赴京参加建设部“城市地铁和轻轨座谈会”情况汇报，孙

宗汾发言说，这次在京拜访建设部和城建设计院，给了我们许多鼓励。周干峙副部长对我讲，武汉的轻轨工程不要急着上，先做工作，十年内上了就不错了。我们的工作该怎么做呢？我认为，不能单一就（京广线汉口段外迁后留下的）旧铁路考虑问题，而应根据公共交通现状和今后一定时期预测，做好全市交通网络规划；旧铁路“走廊”利用，必须与汉口中心区的功能分析结合起来，相互关联综合考虑。近来，利用旧铁路上轻轨的呼声很高，多家外国公司也来探询合作，我们没有方案资料，拿什么跟人家谈？这方面，市规划局力量太弱了，建议由市城建委来抓。王守海听了很以为然，当场拍板决定旧铁路接收利用由市城建委牵头，组成专班开展工作。十年后的2000年12月28日，武汉地铁1号线（轻轨）正式动工，2004年7月28日建成运营，首开武汉乃至湖北城市轨道交通之先河。

作为有名望的城市规划专家，孙宗汾受邀到中央党校为市长进修班讲课；与何澹

芬副市长一起赴欧洲考察；代表武汉市参加联合国在日本召开的“中小城市建设问题”国际会议，用英语介绍中国的建设成就与前景，受到各国代表好评。此外，他不时在报刊发表文章，如《大城市总体规划与交通》《经济中心城市的规划与发展》《控制大城市人口与城市科学研究》等，思路开阔，见解新颖，备受关注。

受聘为武大建筑系主任

孙宗汾对母校武大怀有深厚感情，1983年武大武汉地区校友会成立，任秘书长；1991年理事会换届，任会长。为广泛联络海内外校友，他组织开展各种活动，为武大的建设与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1988年武大成立建筑系，招收城市规划专业本科生，邀请知名建筑专家参与学科建设。不久，孙宗汾工作退居二线，武大校长刘道玉登门造访，聘他为教授；1993年孙宗汾离休，又被聘为建筑系主任。他不计报酬不领薪资，倾尽全力投入教学。

孙宗汾家居汉口，常年坚持定期到校办公上课，风雨无阻。为了充实教学，他利用自己良好的英语基础和积累的丰富资料，不辞辛苦耗时半年，无偿编写出版近10万字的城市规划“专业英语”和“政策法规”讲义。他在“自序”中说：教书和编讲义，一半是奉献，一半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

93级的学生各方面表现都



1950年代中期，孙宗汾（左一）参团出访苏联等国家

非常好，我将这本讲义送给他们，希望他们从中学到知识，受益终生。表达了一位仁厚学者的拳拳之心。

为了充实师资，孙宗汾特邀有实践经验的专业人士来校授课。教授级高工、现任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副局长刘奇志，就是当年受邀者之一。他向我介绍：孙宗汾任市城建委副主任时就认识但接触不多。1993年时我是市规划设计院总图室副主任，也是编制96版武汉总体规划技术专班的负责人，孙主任给过我们许多可贵的指导和帮助，彼此也就熟悉了。之后他接手武大建筑系主任。当时城市规划专业94、95级两个班，每班30人，专业核心课程《城市规划原理》，孙主任要我去代课，一代就是两年。孙主任为建筑系的教学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亲自授课，还要审定重点课程教案；为使教学理论联系实际，亲自带领规划专业的师生到中山大道、江汉路等处实地考察，让我到场介绍区域规划和实施情况。近30年过去了，在当年建筑系基础之上发展起来，以建

筑学、城乡规划专业为主的武大城市设计学院，如今已成为国家重要专业教学单位，孙主任当时的辛勤工作和贡献，是不应忽视和忘记的。

为褒奖孙宗汾的工作业绩和贡献，武大为他成功申报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谦谦君子小事见境界

我于1987年由外地调入武汉市城建委，与孙宗汾同事只有三四年时间，但同住武汉剧院村8号市建委宿舍，楼上楼下达13年之久。作为老领导、老邻居，他给我的印象是风度儒雅、性情恬淡、待人随和，有谦谦君子之风。他是有革命经历的资深离休干部，但从不在人前摆老资格，从不提及有过的光荣历史。

那时是“大建委”建制，全市城建战线十来万人，市委城建工委、市城建委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归口管理城建各局、院、办、总公司和在汉大型央企共20

多个局级单位，领导班子成员上十人，孙宗汾是工委委员、副主任，主管城市规划，分管科教处和联系土木建筑学会，被认为是最无权势的委领导，门庭冷清。他一心一意埋头工作，毫不在意。他是资格很老的正局级干部，按规定配有公车，司机和他住同一栋楼而且车库就在楼



1998年4月，孙宗汾（左）在市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发言

下，但他从不公车私用让家人“沾光”。

为了适应城市建设对外开放新形势，市城建委于1988年底设立对外经济管理处，负责城建系统“三外”（外资、外经、外事）工作，任命我为负责人。工作上我与孙宗汾并无交集，但他很关心外经处的工作进展，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是一项崭新的开创性工作，要大胆地闯但不能急，尤其是引进利用外资，既要积极，更要看准，防止失误。

过了几年，市科委组织编写《当代武汉科学技术国际合作及与港澳台合作》一书，其中第五章“城市建设对外科技合作”由我撰稿，由于情况掌握有限又缺少资料，一度很为写作犯难。孙宗汾知道后，热心指点并提供线索，告诉我哪些内容可去哪个单位（部门）找哪个人，还不厌其烦地介绍19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苏联专家帮助武汉城市规划的工作情况，使我的写作得以顺利进行。他的这种提携后学、乐于助人的精神，令我感念，至今难忘。

1990年之后，孙宗汾不再来市城建委上班了，但不时有报刊、信函从各地寄来，收发员总是要我给他带回家，如此几年。每当接过邮件时，他总不忘记客气地说一声“麻烦你了，谢谢。”

2000年12月17日，孙宗汾因病辞世，终年76岁。21日，市城建委在汉口殡仪馆举行悼念和遗体告别仪式，各方代表百余人为他送行，老市长黎智、副市长涂勇参加悼念，建设部副部长（原武汉市市长）赵宝江发来电唁并送花圈。在现场，人们读到孙宗汾的遗言：



刘奇志（右）同作者忆述孙宗汾往事

多年来共事的老领导、老同志和年青的朋友们，我现在体力不行了，心中始终想念着大家。一年来在医院卧病期间，我内心始终是平静的，本来想病愈后多做些事，既然自己已经知道办不到了，就不再追求生命的延续。身后，我最大的愿望是及早回归自然，不留骨灰。我不是杰出人物，不需要太多的赞扬。晚年，我教了几个班的学生，他们有文化、有知识，都很努力，他们赶上了好时代。我认为只要他们继续努力，多数都能成为有用之才。我希望他们能够为国家出力。

遗言让人们看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豁达的生死观和高尚的革命情怀。在孙宗汾先生谢世22年之际，谨以此文寄托对他的怀念。

张智海，原武汉市城建委副巡视员

汉口法租界梅医生纪念碑

◇ 章辉 袁厚翔

在汉口车站路附近，有一个由中山大道、车站路、岳飞街三条路交汇形成的三角形小广场，底边的老法租界工部局大楼前，曾有一座纪念碑，早已不存。武汉的地方志和各类史料，都没有纪念碑的相关记载，相当长时间还被民间学者误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

在汉口历史上，确实有过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有关的纪念碑，叫作“war memorial”（正式名称为“战争纪念碑”）。这个纪念碑由英租界工部局修建，于1922年11月11日阵亡将士纪念日建成，用于纪念从汉口赴欧洲参战而阵亡的10名英国侨民。纪念碑起初竖立在英租界江边，1927年1月3日因英军水兵刺死中国海员，被愤怒的中国民众砸毁拆除。两年后，纪念碑又在英国领事馆院内重

建，1943年再一次被拆除。同法租界的纪念碑一样，战争纪念碑在武汉正史上也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给后人留下了猜想空间。

纪念碑来历扑朔迷离

为了探索法租界工部局大楼前纪念碑的来历，笔者之一袁厚翔专程到工部局大楼对街的三德里，采访了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丁剑鸣。丁奶奶的父亲1931年就在三德里买了一间临街的房屋，从这间房屋的窗口，能看到工部局大楼前小广场全貌。面对来访者，丁奶奶很坚定地说：“这是梅先生纪念碑，我从小就在这个纪念碑边上玩。”但具体到是纪念哪一位梅先生，老人也说不出来了。

由于武汉历史上曾经发生一次著名的“梅神父教案”，很多人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个会不会是梅神父纪念碑呢？

当然不是的。1923年9月，梅神父因遭匪患而死亡后，汉口“地皮大王”、知名教友刘歆生拿出了三千平方丈的地皮，湖北省政府拿出了6万元现金，在汉口铁路外建立了一个“梅神父纪念医院”，并于1926年元月在医院内修建了梅神父纪念碑，湖北督军肖耀南题写了碑文，平和解决了“梅神父教案”引发的涉外纠纷。而且，梅神父是意大利人，不可能在法租界再为他修一个纪念碑。

经过翻阅当年的档案资料和外文报刊，才知道法租界这个纪念碑建于1932年，距离一战结束已很久了，显然与一战无关。那么，这个纪念碑到底纪念何人呢？经过多渠道追踪大量史料，终于搞清楚了纪念碑的来龙去脉。

这个纪念碑名叫“梅医生纪念碑”，是纪念在汉口去世的法国海军军医梅斯尼。

汉口铁路医院首任院长

梅斯尼的全名叫作 Joël Julien Emile Mesny，音译为乔尔·朱利安·埃米尔·梅斯尼。通常简称为乔尔·梅斯尼 (Joel Mesny)。由于常年生活在中国，他还有一个非常优雅的中文名字“梅旒”，有时候也被音译为“麦斯尼”，当时的汉口人喜欢将他称为“梅医生”或“梅尼医生”。

梅医生 1868年1月23日生于法国布列塔尼半岛西端的小城布雷斯特 (Brest)，这是法国西部最大的海军基地。1897年新婚不久，梅医生参加了法国军医海外服务团来到汉口，担任法租界驻军和警队的少校军



法国军医海外服务团合影，后排右一、右二为梅斯尼兄弟

医，最终在汉口去世，在汉口生活了35个年头。

由于专业术语和计量单位的不同，汉口的外国医院存在着严重的门户之见。教会医院长期被英美系医生和意大利系医生把持，市立医院或私立医院又被日德系医生把持。英美系医生使用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并使用英制计量单位，日德系医生使用德语作为工作语言并使用公制计量单位，而法国医生使用法语和公制计量单位两头不靠，无法在汉口的医疗系统立足。法租界虽然是五大租界中人口最密集的一个，却没有一家大型综合医院，只有一些日本医生开设的小诊所。因此，一个法国军医实际上没有多少机会对社会大众行医。

但凡事都有例外，汉口恰恰有一个完全使用法语作为工作语言的单位，那就是承建京汉铁路的“中国铁路比公司”。这是一家法国、比利时合资公司，由于比利时也通行法语，于是京汉铁路长期以法语作为标准的工作语言，一直到1934年才改用汉语。

1897年7月，京汉铁路开始从北京、汉口两端对向施工，梅斯尼受法国领事馆委托，在刘家庙开设诊所，为法、比两国工程技术人员提供医疗服务。1906年京汉铁路全线通车，梅斯尼又担任了京汉铁路刘家庙医院院长，汉口铁路医院的院史上，留下了“梅尼医生为首任院长”的记载。

京汉铁路刘家庙医院的位置，在江岸火车站的东南方向。从地图上看，这家医院的面积不算小，远大于江岸火车站的面积。刘家庙车站后改名为江岸火车站，现已拆除。汉口铁路医院现改名为汉口医院，院址在江岸区二七侧路7号。

建立法租界防疫体系

如果梅斯尼只是一个普通医生，那他去世后不会竖立一个纪念碑，这是源于他在汉口的这段时间，为医疗、防疫做出了一定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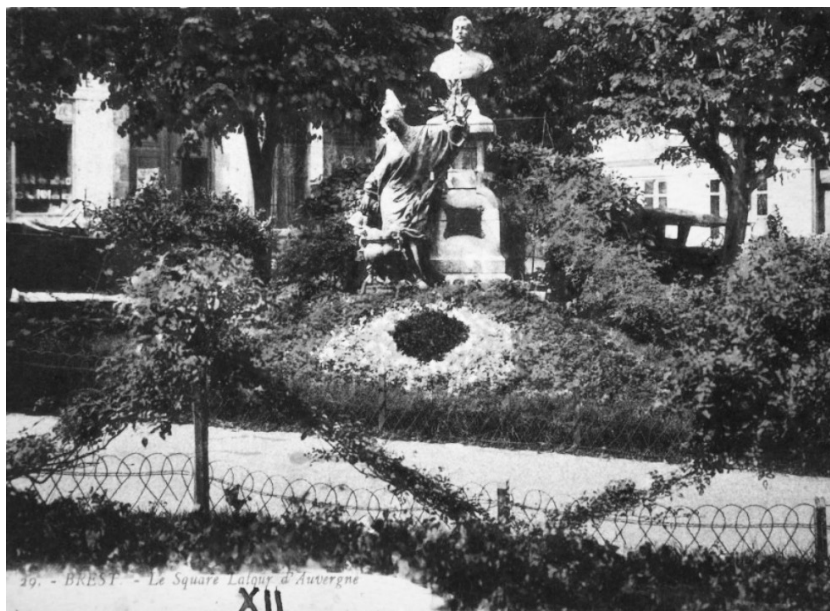
梅斯尼出生于医学世家，父亲安格·玛利·梅斯尼就是一名医生，弟弟是为中国防疫事业建立过功勋的杰拉尔德·埃米尔·梅斯尼医生，中国史志上一般记载为G·梅斯尼医生。

G·梅斯尼1869年3月28日出生在布雷斯特，也是海军军医，1893年12月受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委派，在天津开办了北洋医学堂（现河北医科大学），为北洋水师培养军医。北洋水师战败后改建为北洋军医学堂，G·梅斯尼继续

担任首席教授。G·梅斯尼是防疫学专家，亲手组建了天津最早的防疫体系。但遗憾的是1911年1月，他孤身一人去哈尔滨抗击东北鼠疫时，因不认同中国医生伍连德提出的“肺鼠疫”可以通过飞沫传染的理论，坚持不戴口罩检查病人，终被感染鼠疫而以身殉职。G·梅斯尼去世后，法国军医服务团在其家乡布雷斯特为他建立了一个纪念碑。纪念碑由G·梅斯尼半身像、满洲女性和一个香炉组成，至今保存完好。

梅斯尼与其弟弟一样，也是一位优秀的防疫专家，兼任工部局董事会董事，负责整个法租界的防疫、卫生工作。他为汉口建立了最早的24小时流行病汇报体系，如流行性疾病申报制度和下水道清淤制度等。工部局规定：在租界内如果发现了急性传染病，必须在24小时内向工部局汇报，否则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炎热潮湿，瘟疫流行。汉口水路的防疫由英租界工部局负责，铁路的防疫自然就是由梅斯尼主导下的



法国布雷斯特市的G·梅斯尼医生纪念碑

京汉铁路医院负责了。京汉铁路建立了武汉最早的防疫系统,阻止疫情沿铁路传入汉口。

应该说,梅斯尼的防疫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老汉口人都清楚地记得,夏天租界地区是没有蚊子的,同时杜绝了各种流行病在租界地区的传播,这一切都与严格的防疫措施分不开。

“客运大王”败北罢工

除了负责法租界警察和军队的医疗工作以外,梅斯尼还积极投资租界地区的公共交通建设。1901年他与和利冰厂的老板柯三,在法租界巴黎街合资开办了汉口第一家人力车行——利通人力车行。1912年又开办了汉口第一家出租汽车公司——利通汽车行。

人力车俗称“东洋车”,1888年传入汉口,开始时是私家包车。1901年英租界工部局批准人力车成为客运工具,它很快就取代了轿子、马车,成为汉口租界内的主要交通工具。为避免恶性竞争,首批在租界正式登记的人力车限1000辆,其中规模最大的就是梅斯尼的利通人力车行,拥有人力车336辆,占总量三分之一,他俨然转型成为租界地区的“客运大王”。

人力车采用三人包车制,一辆车三个工人轮流拉,各自缴纳份子钱。车夫收入微薄,仅够勉强糊口。1921年5月1日,由利通车行领头,各人力车行老板宣布加租,将每日每乘800文增加到每日每乘900文。对此,工人自发掀起了一次罢工斗争。各车行老板见势不妙,连忙取消加租,这次罢工仅一天就取得了胜利。

1921年12月1日,人力车行老板在利通车行的带领下,再次宣布加租,由每日每乘800文增加到1000文。此举激起了工人的强烈反抗,掀起了罢工怒潮。这次罢工由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派施洋、林育南、郑凯卿直接领导,最后取得了胜利。

12月7日劳资双方的矛盾激化到顶点。为争取各界的同情和声援,数千工人组成“车夫乞讨团”,结队向租界游行,沿途散发《罢工宣言》《告各界老兄弟姐妹书》等传单。游行进入法租界时,当局出动巡捕阻止队伍通过,工人们不顾拦阻向前涌进,走到利通车行门前,梅斯尼避而不见,并通知巡捕逮捕了4名工人。工人们愤而捣毁了利通车行,砸烂了梅斯尼住宅的玻璃,击毁了车行内的汽车电灯数枚,并与巡捕发生冲突,抓获了2名安南巡捕到华界,交付青年会暂扣。

最后经多方调解,梅斯尼被迫答应条件:允许车夫工会成立、车行暂不加租、罢工期内每人每日补助2角以赔偿损失,罢工又一次以工人的胜利而告终。



法租界工部局前的梅医生纪念碑与走过的人力车

从1921年12月1日开始，连续7天的汉口人力车夫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领导的工人运动。这次罢工的胜利，对梅斯尼和利通车行的打击尤为严重，罢工结束后他就宣布退休，并退出了法租界工部局董事会，继续在铁路医院供职，并从事一些慈善事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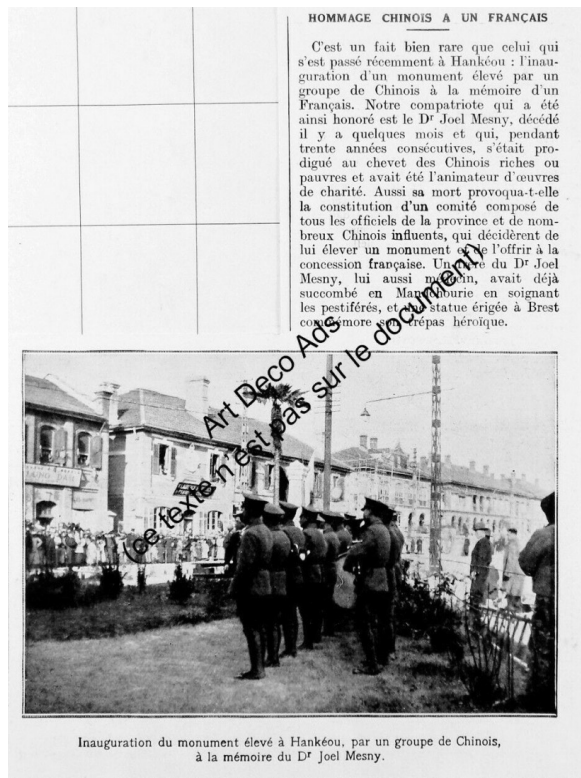
纪念碑毁于美军轰炸

1932年7月5日，梅斯尼在汉口去世，终年64岁。

不久，在工部局大楼广场，举行梅医生纪念碑揭幕仪式，报纸刊载了《中国民众向一位法国人致敬》的新闻和图片。图片下的法文注释为“中国汉口 乔尔·梅斯尼医生纪念碑揭幕仪式”，新闻报道提到了梅斯尼兄弟两人对中国防疫事业的贡献，大意是：“一群中国人在汉口为一位法国人的纪念碑落成举行典礼。这是一个罕见的事情，这位法国人对中国的富人和穷人都有很大的帮助，是慈善事业的领导者。他的去世后，当地官员和有影响力的侨民决定为他竖立一座纪念碑，并将其献给汉口法租界。梅斯尼医生的一位兄弟，也是一名医生，已经在满洲里治疗鼠疫患者时死亡，在法国的布雷斯特市竖立有一座雕像纪念他英勇的献身精神。”

非常有意思的是，图片上一排欧式洋房，最左边二楼的两个窗口就是丁剑鸣奶奶的家，站在她家的窗口，可以完整地看见梅医生纪念碑和广场上举行的各种仪式。从丁奶奶的父亲买下这套房子起，丁家人一直居住在此，已有91年的历史了。

二战末期，汉口是日军在华中重要的补给基地，受到美国空军多次猛烈轰炸，租



梅医生纪念碑揭幕仪式

界地区更是重点。轰炸中，法租界工部局大楼严重受损，梅医生纪念碑彻底消失。

由于梅医生纪念碑存在的时间较短，在收回法租界时又没有相关移交档案的记录，所以武汉史学界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纪念碑，只是几位人文爱好者从老照片上看到，并将其误读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碑”。

2022年7月，恰是梅斯尼去世90周年，特写此文以澄清历史迷雾。

章辉，长江智联技术有限公司总工程师；袁厚翔，武汉公交集团公司退休干部

鸡公山上的老汉口史迹

◇ 靳小蓉 万建辉

2022年武汉遭遇历史未见的高温，市民纷纷外出避暑。想起鄂豫两省边界的鸡公山，曾是老汉口人避暑的“后花园”。

1902年，卢汉铁路汉口至信阳段通车，美国传教士李立生、施道格乘火车到鄂豫交界处的新店站下车登山，发现鸡公山可避暑。1903年，他们在鸡公山建起了第一栋别墅。此后23年间，欧美23个国家的传教士、商人及国内军阀、巨贾纷至沓来，共建避暑别墅500余栋，使得鸡公山一时成为“万国建筑博览会”。

2019年7月和11月，笔者曾两次前往鸡公山，徜徉在近代百年建筑群中。武昌路、湖北路、江汉关避暑地界碑、汉口会馆、肖耀南公馆、马歇尔楼、美龄舞厅、花旗楼、

巴公别墅、汉协盛别墅、亚细亚别墅、三菱别墅、韩复渠衣冠冢……眼前接连呈现与老汉口有关的地名和人物。

众多历史建筑诉说汉口往事

鸡公山的发现者、第一栋别墅的主人李立生，就来自汉口。

1890年，李立生从上海乘船到汉口，不久到武昌学习汉语，之后在襄阳、信阳传教。汉口成为他往返鸡公山和往返美国的据点。

鸡公山风景区管理局原局长、鸡公山万国文化研究会前会长姜传高介绍，1930年代在武汉任职的张学良，曾上鸡公山避



摄于1950年代，中间白色四坡屋顶房子为刘子敬别墅，其后高大别墅为颐庐，右边是女信义会别墅

暑，并提出整治鸡公山避暑地区；1938年武汉保卫战，蒋介石两度上山，在山上召开过军事会议；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鸡公山山脚下一栋别墅，曾作为解放军部队解放武汉的指挥部使用一个多月。

位于鸡公山中部的消夏园，其东面山顶的马歇尔楼，是汉口俄国商人1910年前建成，廊道顶端的“洋葱头”屋顶显示出俄罗斯建筑风格。1946年初，在宣化店调停国共内战的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因调停失败而没有上山居住为其准备的这个住所，后人仍称其为马歇尔楼。如今，楼内布置有宣化店谈判展览及周恩来、马歇尔等人的图文资料。

姜传高还介绍，1929年，武汉大学农学院与京汉铁路局商定，划出鸡公山部分林场供学生实习。山上建起了武大农学院场部，师生在此山坡育苗，培育优良树种。抗战初期，国共多个抗战机构设在农学院场部。

清末民初的汉口万国商会会长、英国人柏尔恩，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曾斡旋革命军和清军，多次促成双方停战。柏尔

恩在鸡公山建有多处别墅，尔后出售给传教士和商人。2018年10月，柏尔恩的孙女、70多岁的澳大利亚SBS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詹妮弗·柏尔恩来鸡公山寻根，拍摄了相关纪录片。

鸡公山景区管理局考证，位于鸡公山东南的美龄舞厅附近，有一栋两层别墅，名为花旗楼，也为柏尔恩所建。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曾秘密上山住在该楼作为临时行营。该楼后来破损严重，1980年代原址重建，如今作为武汉会战纪念馆布展，楼底的防空洞修复，对游客开放。

1920年，来自国内多省的传教士，其中大部分是美国传教士，在鸡公山成立中华信义会总部。此后每年夏天，中华信义会的传教士来鸡公山避暑度夏，同时开会。传教士的子女，留在鸡公山美文学校等外国学校上学。而中华信义会另一个办公点，就在汉口洞庭街77号楼，称为汉口信义会公所，主要为华中地区传教士途经武汉时提供住宿、联络和代办各项事务。宋美龄、蒋经国等途经武汉时亦寓居于此。该楼现为武汉基督教协会办公地。

1915年，接收传教士子女入学的学校，正式定名为鸡公山美文学校，首任校长是挪威裔美籍人士阿格尼斯女士。因鸡公山匪患，她曾带领60名学生暂住汉口北郊的滢口神学院。1925年，阿格尼斯肾病恶化，于当年底到汉口天主教医院住院治疗，不久去世。阿格尼斯献身教育事业，终身未婚，去世时年仅45岁。

美国传教士玛丽·安德逊女士，1897年由教会派到中国汉口学习汉语，做基督教工作。1901年，她和传教士李立生到信阳传教。1902、1903年，她两度随李立生勘察鸡公山。此后几十年，她在信阳传教，并成为当地一所教会学校的筹备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玛丽·安德逊被日军扣押至汉口，1944年在武昌集中营去世，教会成员将她葬在汉口国际公墓。

巴公房子为万里茶道增添新遗存

俄国茶商巴诺夫在汉口鄱阳街所建巴公房子，已成为老汉口地标和众多外地游客的打卡地，是目前正在进行的万里茶道“申遗”的重要遗产点。2019年11月，笔者在鸡公山发现另一处巴公房子，它和汉口巴公房子几乎同期建成，为巴诺夫在鸡公山的避暑别墅。

汉口巴公房子的主人，是俄国贵族“大巴公”和“小巴公”巴诺夫兄弟。大巴公1869年来到汉口，不久被新泰洋行聘为大班。1874年，大巴公同

几名英商、俄商开办阜昌洋行，他做了阜昌洋行的联合经理。1896年俄租界设立时，他被推选为俄租界市政会议常务董事，之后还出任过俄国驻汉口领事。

2019年7月底，笔者首次游历鸡公山，在邮局买到姜传高先生所著《鸡公山史海钩沉》一书，回来细读发现最后一章竟有“巴公往事”一节，其巴公正是汉口茶商“大巴公”巴诺夫，惊喜之余，迅速联系上姜传高先生。

和姜老约好后，11月8日驱车第二次上鸡公山，目睹了巴公房子的真容。它位于鸡公山去报晓峰主干道和去颐庐的交叉口，是一栋红瓦、四坡顶、石墙的平房，东西两面有门，门前挂有“鸡公山派出所”的牌子。

墙上铭牌显示“巴公别墅”，编号104号，属鸡公山早期建筑，建筑面积216平方米，1910年前建成。因年久失修，1985年原址原貌重建，原建筑为镶铁皮瓦楞屋面，石墙为就地取材的鸡公山花岗岩。走进别墅内，中间是一条过道，过道南北分别有5个和4个房间门，呈对称分布。



巴公别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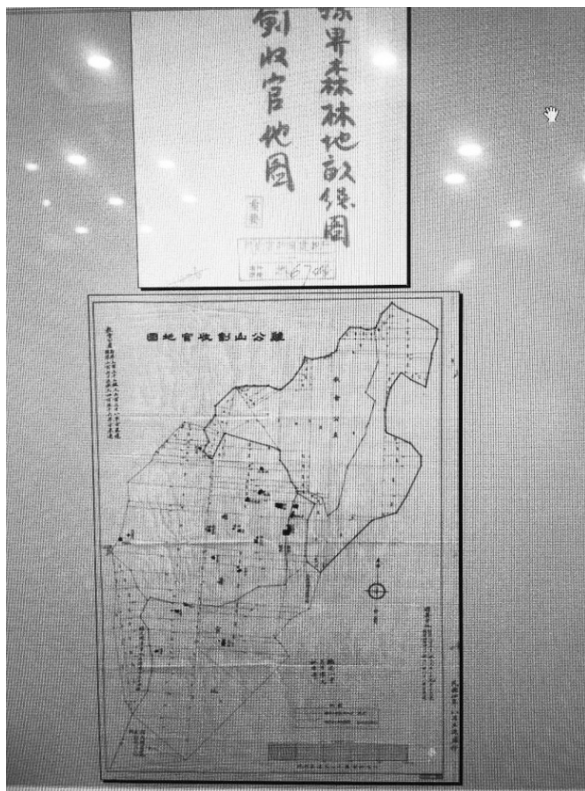
如何证明眼前的房子主人就是巴诺夫？11月10日，笔者在信阳城里拜访到姜传高和鸡公山万国文化研究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何军。

何军告诉笔者，1980年代，鸡公山当地人只知道这栋别墅的主人是俄国人“拔贡”或“八贡”，具体为何人不可考。几年前，他看到作家方方《汉口的沧桑往事》中的《巴公房子》，联想到鸡公山104号别墅主人“拔贡”，读音上惊人相似，遂前往湖北省档案馆查阅鸡公山档案，在一份1915年的《鸡公山划收官地图》里，找到了现在的104号别墅的主人，证实该别墅主人确为巴诺夫。

鸡公山当年地跨鄂豫两省。1949年前，鸡公山管理机构长期属湖北省设置，管理官员由湖北省委派。11月12日，笔者前往湖北省档案馆，在电子档案库里输入《鸡公山划收官地图》，果然搜出“湖北省政府建设厅、市政建设类、674号”档案，内含《鸡公山划收官地图》《鸡公山豫界森林地亩总图》两份档案。泛黄的《鸡公山划收官地图》中一栋房子标名“班洛夫”，右边不远一栋房子标名“刘子潘”，该图时间落款为“民国四年八月”。

当年的“汉口首富”刘子敬正是巴诺夫阜昌洋行的买办，他俩在鸡公山的别墅挨得很近，只是名字因音而有别。由此证明，现在的104号别墅，是巴公别墅确凿无疑。可推测1910年到1917年，巴诺夫应多次到自己的别墅避暑度假。

巴诺夫、刘子敬二人都是汉口巨富，为何只在鸡公山建平房别墅？何军说，鸡公山别墅建设分两个阶段，巴诺夫别墅和刘子敬别墅都在早期阶段，受当时技术、材料、交通各方面条件限制。这一阶段的外国传教



《鸡公山划收官地图》

士建的别墅，也多为一层平房，造型朴实，注重实用。

十月革命后，俄商在中俄之间的茶叶贸易受到抑制，在汉口经营的茶叶市场日渐萧条。1917年，顺丰和阜昌砖茶厂首先停闭，新泰砖茶厂苦撑到1932年转租英商，被英商改名为太平洋砖茶厂。

巴诺夫1921年离开汉口，作为“白俄”他已无法回国。据武汉作家胡榴明撰文介绍，有天津人士称1940年代，巴诺夫从天津乘火车来汉口，在平汉铁路的火车上突发疾病身亡。他在汉口和鸡公山的巴公房子，在他生前早已转手。

“汉口首富”刘子敬荣极而衰

刘子敬有着“汉口首富”“茶叶大王”和“长江流域第一买办”之称，20世纪初

到民国初年是阜昌洋行的买办，受雇于巴诺夫。在鸡公山巴公房子西侧，往颐庐别墅方向不到200米处，一栋外形类似的石墙红瓦房子，就是刘子敬别墅。

2019年11月9日上午，笔者来到刘子敬别墅前。眼前是一栋大窗、石墙的平房，坐落于高坡之上。房前山林、别墅风光尽收眼底。墙上铭文记载1910年前后建成，建筑面积184平方米，南北向，南边门外筑石阶扶手，铁皮屋面，白铁皮封檐，落水管排水。进到屋内，西侧、南侧留为宽大走廊，东南风可过大窗而入。共有5个房间，木地板、壁炉和房顶烟囱仍在，均陈旧斑驳给人以沧桑感。

“刘子敬别墅，得益于《鸡公山划收官地图》的考证，和巴公别墅是同时确认的。”何军告诉笔者，两栋别墅外形相似、位置相邻，基于巴诺夫和刘子敬的主雇关系，巴公别墅有可能是刘子敬讨好主人，为巴诺夫建的。

两人都曾是大汉口呼风唤雨的人物，



刘子敬别墅

然而好景不长，十月革命带来政局变化，直接影响到茶叶贸易，两人很快消失在历史洪流中。

据湖北省社科院“中俄茶叶之路”课题组专家艾杰介绍，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俄国茶商雇佣了一批中国人为其经营管理，刘辅堂、刘子敬父子就是这期间成长起来的汉口最大“买办”。

刘子敬之父刘辅堂走入外贸经商一途，是从他考入江汉关担任中文书记员开始的。当时他认识了来汉口建砖茶厂的俄商、新泰洋行大班巴诺夫，后应巴公之邀到新泰工作。1894年，刘辅堂先后被提拔为新泰的“管厂”和买办，正式步入买办阶层。

刘子敬1883年出生在汉口，1905年父亲刘辅堂去世时，他在武昌美国基督教圣公会的文华大学读书，1906年被阜昌洋行录用，继承其父买办之职，成为当时汉口最年轻的买办。

刘辅堂留下200万两银子的家底，刘子敬向其他行业投资，首先是与茶业密切相关的金融业。他兼任俄商道胜银行买办，他弟弟刘端溪任美商花旗银行买办。1912年刘子敬在汉口花楼街合股开设“广大钱庄”，利用他买办的地位，以道胜银行代收的中国盐税放贷于广大钱庄，转贷于市场大获其利。

刘子敬另一大贸易是于1920年开设“义隆进出口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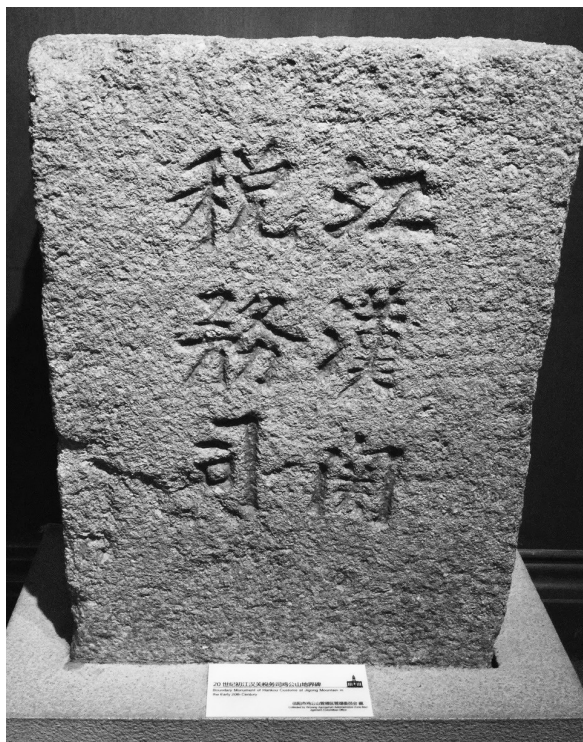
易公司”，做桐油出口，后来又代理了美商美亚保险公司的国内保险业务，还开设了“义隆油厂”加工出口桐油。1912年与人合资开设“发华蛋厂”，从事蛋品加工与出口。1918又在河南漯河开设“新华蛋厂”，1919年在郑州开设“中华蛋厂”，并在汉口开设“中华制蛋公司”。1919年又与人合资在武昌上新河街创办了“震寰纱厂”，成立纺织公司，1922年开工。

投资房地产也是刘子敬在茶叶生意发家之后的大手笔。刘辅堂在世时，已于1902年在汉口友益街修筑近代弄堂建筑辅堂里。之后，刘子敬又修建辅义里、辅仁里、辅德里和方正里等弄堂建筑。庐山芦林一号公馆，亦为刘子敬修筑。刘子敬的汉口公馆为刘辅堂所建，公馆旧址在原法租界同兴里。

刘子敬还担任汉口红十字会会长、汉口商会总会董、华商跑马场董事长，并于1913年在汉口华清街开办辅德中学，即今市十六中学旧址。1914年他又开办硚口惠民亭小学。

刘子敬引领汉口时尚，他有私家车，车牌号为02号，仅次于英领事馆的01号，是汉口最早拥有汽车者。他也有自备的小轮船，经常邀约政商与教会要人乘船到武汉近郊的滢口、金口等处打猎。每年秋季，要在公馆举办菊花展。最高峰时，刘子敬有资产合银子800万两。

十月革命发生后，阜昌洋行无法经营茶叶，刘子敬失去买办一职，自己的茶行也随之倒闭。到1927年，因为巴黎总行外汇投资失败，道胜银行最终清算结束在汉口的业务，刘子敬又失买办一职，自身的钱庄也关门大吉。同时，纱厂亏损，蛋厂成品被其弟作赌金输光，运锡矿货轮被击沉于大西洋，房地产贬值加上高利贷恶性循环，最后



20世纪初江汉关税务司鸡公山地界碑

因为其弟刘端溪的花旗银行买办一职被解除，美亚保险业务也随之丢失，市场信用完全破产。

忧郁之中，1928年刘子敬病逝于庐山芦林一号，年仅44岁。也有一说是，他在别墅中饮弹自杀。

笔者走访发现，除刘子敬之外，鸡公山上来自汉口的中国官商留下的别墅，不可胜数。曾任湖北督军的肖耀南，在鸡北坡半山腰留下公馆，成为体量最大的私家别墅。1938年在武汉被处决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韩复榘葬在鸡公山，留有韩复榘衣冠冢。

靳小蓉，江汉大学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讲师；万建辉，长江日报社主任记者

走近聂华苓

◇ 尹新秋

以前只见过读者簇拥着著名作家，而在香港浸会大学见到聂华苓，却是另一种场面：读者之外，一些名作家围在她身边，也在“众星捧月”。

聂华苓是我们武汉人，当她 2009 年 11 月到香港浸会大学讲座时，我们武汉电视台一路跟拍她在校园的活动，约好专题采访，近距离走近了这位 84 岁老人。

影响世界文坛的“计划”

聂华苓一来，“爱荷华”就听人说得多了。浸大的国际作家工作坊，借鉴了“爱荷华国际作家写作计划”模式；浸大文学院院长、工作坊主任钟玲，去过爱荷华；这一年浸大邀请的大陆作家毕飞宇，也得到过爱荷华的邀请；好几位参加过写作

计划的作家，知道聂华苓到了香港，专程来看她。谈论过往，沉浸在爱荷华的明月清风之中。

参加过“爱荷华国际写作计划”的作家，都很喜欢谈那段经历。虽然只有短短三个月，但写作计划，会相伴一生，常忆常新。

文学的世界性，不再隔着五湖四海。就在爱荷华，就在作家公寓，就在聂华苓家的客厅里。不同国家，不同种族，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作家，在这里风云际会。尽管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也不一定相通，但并不妨碍增进了解。同行的状况，文学的发展走向，不再经过媒体和作品“转述”，而由自己近距离观察，真切感知，“读”到的是一个个真实的“文本”。

这是一个了解世界的窗口，一个文学“朋友圈”。你可以到爱荷华大学去教课，



聂华苓

也可以不教。你可以创作，也可以不创作。座谈，研讨，说什么都行，不说也行。争吵也行，打架也行。用聂华苓的话说，跳河也行。做什么都没人问你，没人管你。国界跨过了，原有的框框全打破了。

汪曾祺说聂华苓是“心血来潮，感情用事，居然成事”。

一次，聂华苓和丈夫安格尔泛舟爱荷华河。安格尔提起退休的打算，聂华苓突然建议：“你为什么不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写作计划？”

安格尔是美国著名诗人，曾被总统约翰逊聘任为美国首任国家文学艺术委员会委员，并任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顾问。1934年，他在爱荷华大学创办面对美国年轻作家的工作坊，逐渐在全美赢得了声望。声望有了，经验有了，就是没钱。一位国际作家的经费，就需要几千美元，但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办起来了，居然办成功了。经费最初由她们夫妇自筹，后来得到一些基金会、学术机构以至国务院的资助。

1967年创办以来，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多名作家，获邀到访爱荷华。受邀作家，在文学界都很有影响。就华文作家

来说，萧乾、丁玲、吴祖光、徐迟、王蒙、艾青、汪曾祺、莫言、张贤亮、茹志娟、王安忆、迟子建、余华、苏童、毕飞宇、余光中、白先勇、柏杨、陈映真、郑愁予、蒋勋、林怀民、骆以军、李欧梵、董启章……名字都很响亮。如果要写一部华语世界的当代文学史，根据这些名字，就可以拉出一个粗略的大纲。

爱荷华大学，一个以理科为主的学校，因为国际作家写作计划获得了文科方面的声誉。爱荷华也因国际作家写作计划，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学之城”称号。美国华文文学在那个年代形成高潮，也是由这个写作计划引领风骚。1976年，聂华苓、安格尔夫妇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聂华苓被尊为“世界文学组织之母”。

作家这个手工作坊式的职业，比其他职业更需要融入世界，作家比谁都更渴望与人交流，尤其是同行间的交流交往。我从几位知名作家对聂华苓的敬意和谢意中，看到了那种需求与渴望。

讲座中回响的“三生三世”

聂华苓在浸大开了两次讲座。11月9日是《华人作家与世界文坛》；11月11日是《个人创作》。她领受浸大荣誉文学博士的致辞，是《个人创作与世界文学》。

题目都很大，实际是个人视角，谈的是个人经历、个人创作和夫妇俩创办的国际作家写作计划。她说她是一棵树，根在大陆，干在台湾，枝叶在爱荷华。这样一谈，当然就谈到了中国，谈到了华人作家和世界文坛。

聂华苓1925年生于武汉。爷爷中过举

人，是个没有留下诗的诗人。她写作的种子，在爷爷吟诗的时候就种下了。爷爷一心想做官，好不容易谋到一个知县，坐着轿子去上任，还没到衙门，辛亥革命爆发，又坐着轿子回来了。

父亲毕业于陆军军官学校，是桂系。桂系控制武汉时，做武汉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后来桂系被蒋介石打败，父亲逃到日租界。1935年去贵州做专员。母亲生下她以后，才知道丈夫已有妻室儿女。丢不下孩子，隐忍一生，1962年肺癌去世。

聂华苓小时候遇上混战，读中学遇上抗战，读大学遇上内战。她一生都在逃，逃，逃，不停地逃。武昌逃到汉口，汉口逃到宜昌，宜昌逃到重庆，重庆逃到南京，南京逃到北京，北京逃到沈阳，沈阳逃回武汉，大陆逃到台湾。到台湾，进入胡适和雷震创办的《自由中国》半月刊做编辑。没想到逃离了战乱，没逃过政治。因为《自由中国》宣传自由民主，抨击独裁，被蒋介石查禁。雷震被捕，她也受到监视。

聂华苓的第一任丈夫是大学同学，婚后生了两个女儿。后来，婚姻名存实亡。安格尔的出现，是照进她生命的一道光。她1964年到爱荷华，1971年与安格尔结婚。漂泊一生，终于找到幸福港湾。但造化弄人，1991年和安格尔去波兰领国际文化贡献奖，安格尔在芝加哥机场突发心脏病，撇下她匆匆走了。

聂华苓的创作，自传《三生影像》不用说，散文小说，也主要是写自己的经历。她的经历，在外人眼里是一部传奇。于她自己，是压在心上的一座山，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不写不快，不写不安。她没说她用了什么创作手法，她没说她用了什么文学技巧。也许她压根就没考虑什么手法、什么技巧。

尽管她的构思选材都很讲究，语言有一种简约之美。她只是跟着那种丧失感在走，跟着与命运抗争的生命张力在走。一次次变故，一次次乱离，一次次流亡，一次次挣扎，写出来，就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

知道了聂华苓的“三生三世”，回头来看写作计划，就不完全是“心血来潮”。她邀请国际作家，当然要写好，但有偏向。中国作家请得多不用说，第三世界的作家请得多，南美洲独裁政权国家的作家也请得多。有的在寻求政治避难，有的刚从牢里出来，爱荷华是他们的栖息地。她的“心血”经历了流亡，经历了漂泊，早沸腾着安定自由的热望。为同行也为自己抚慰心灵，这个计划，她应该早就有了。

听聂华苓的讲座，很享受。不是怕她说多了，而是嫌时间过得太快了。她的人生遭际和她说到的人，都很有故事。她的叙述，又很精彩。轻松，幽默，在笑声和掌声中娓娓道来。说到兴头上，她会朗声大笑。那种大笑，不掺杂质，没有一点顾忌。

徐迟所说的“性格有很多色彩”

聂华苓的衣服很亮丽，多色搭配，花纹图案都很醒目。据说她给自己准备的寿衣，是一套银色丝绸。她要给幽冥世界，也带去亮色。服装和性格有没有关系，有怎样的关系，不太好说。但我自然想到了徐迟说的：聂华苓感情热烈，性格有很多色彩。经历了采访的事，真切感受到，她的性格就像她的衣服一样鲜明。

这样一个武汉走出去的作家，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当然想请聂华苓对着我们的镜头谈谈文学，谈谈家乡。但要采访到她不容易，她的活动安排得很满。校内，



聂华苓在香港浸会大学讲座

有座谈会，有讲座，有荣誉博士的颁授礼，还有那么多文学圈的朋友要见要谈。校外，香港的媒体要做访谈，要做节目。80多岁的老人，虽说精神健旺，也够她去应付那些满是热情的日程。

我们不好意思到老人的房间去打扰。好在我们摄制组的时间很充裕，应邀来拍纪录片，也住在学校，可以见缝插针。她在校园的活动，我们一路跟拍，一项也没有落下。做一个片子，拍的镜头够了，同期声也够了，只待她的采访“画龙点睛”。那天，座谈会还没开始，同她约采访的事。知道我们来自武汉，觉得亲切，说就在座谈会以后，答应得很爽快。

采访的内容，早就想好了。坐等的时间，又梳理了一遍。

1980年寒假，我去拜访武汉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李恺玲教授。她教现代文学。谈到一些作家，提到聂华苓是她同学，从国立十二中到国立中央大学。她写过一本《与聂华苓一起流亡》。聂华苓的《三生影像》也多次写到她。我想，这是一个容易拉近距离的“引子”。

聂华苓写李恺玲多才多艺，会演话剧，

会朗诵，会打篮球排球，作文好，同学们都说她是未来的作家。同时，又写了一些可以看作缺点的特点：倜傥不羁，瞧不起人，有时眼神里还含着讥讽。聂华苓——“秉笔直书”。这让我想到“文如其人”。作家的性格，会影响到作品的风格。她那种真性情，成就了作品的真文字。萧乾说她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是“散文的史诗”。史性，诗性，都来自真。

文学创作，可以请她谈很多。她说根在大陆，她大陆的根应该在武汉。接下来可以谈武汉谈乡愁。聂华苓在爱荷华的房子，从窗户可以看到爱荷华河。滔滔河水，总让她想起长江，想起长江与汉水交汇处的汉口。汪曾祺在《遥寄爱荷华》一文里，提到聂华苓给他们做过湖北菜“豆腐丸子”。聂华苓同弟弟打电话，说的是湖北话，我想就是武汉话。武汉送走了她的童年。人到老年，童年就是最温暖的回忆。

座谈会完了，我们连忙跑过去，架好机器，接上话筒，进入采访状态。聂华苓却站起来，说累了，说完就往外走。我有些失望，但很快释然。反而觉得她很可爱。这才是聂华苓！随心，率性。不是这样的性情，恐怕不会有那些性情文字，也不会有爱荷华国际作家写作计划，世界文坛都会少很多色彩。

我跟在一拨人后面，送聂华苓到室外。金秋时节，阳光温而不燥。她那身衣服，格外鲜亮耀眼。

尹新秋，武汉电视台高级编辑、原海外专题部主任